

炎黄春秋

第 **10** 期
2009年

目睹新中国开国大典

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青海二·二三事件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

列宁《政治遗嘱》的风波

目 录

一家言	
1	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余 孚
7	《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 秦立海
求实篇	
10	青海二·二三事件 孙言诚
19	毛泽东入党年月考 向继东
亲历记	
22	目睹新中国开国大典 郭 英
27	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阎明复
29	大跃进中亳县干部作风问题记述 梁志远
33	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李世华
春秋笔	
34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 徐云根
39	武汉、贵阳解放的“南京模式” 郑亚宇
往事录	
44	五星红旗的故事 俞乃蕴
46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 吉 元
50	揭秘台湾地下党 蒋益文
随感录	
53	“克虏伯”大炮的沉思 余良明
56	卡廷惨案:历史不能永久地被掩盖 陈继礼
访问记	
60	彭涛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访姚依林 彭定安
故纸堆	
62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 尹曙生
忏悔录	
64	生命的暗夜 陆晓娅
怀人篇	
68	项南支持舆论监督 张玉钟
70	理论超前的经济学家董辅初 张素芳
74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 李兴勇
海外事	
76	列宁《政治遗嘱》的风波 尹 彦
品书斋	
82	凭空编造 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 高 勇
编读窗	
87	读者来信摘登 任振邦
封三 李锐国庆感怀(诗二首)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 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本期: 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杨继绳

审校 赵友慈

重新启蒙： 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 余孚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今年 2009 年,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 1915 年 5 月 25 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 月 12 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 9 月 15 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启蒙运动的序幕。1919 年 1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正在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对全国人民启蒙而前进时,列宁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欺骗”,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从要求民主和科学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了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来被普遍宣传的《共产党宣言》告诉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再容纳不了它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将要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妙的社会,至于马克思为了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妙的社会,前提条件是要把一切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陈独秀还不知道。至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机构就会变得像工厂里的会计和监工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苏维埃的专制政权却立即迅速膨胀,官僚化和没有效率,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能恢复工农业生产,全国陷入饥饿,强征农民粮食,没有工业品交换,既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又使得工人很不满意,甚至造成工人的游行示威。列宁还未病倒以前,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斯大林利用他的管理组织的职务已经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在列宁病倒以后,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束手无策,只能痛苦地死去。陈独秀对此毫无所知。陈独秀是在既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二、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陈独秀在一开始投身于启蒙运动时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内容就那样明

确的,陈独秀在1904年在他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还只提出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他的《新青年》时写的《敬告青年》,第一次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作为要求青年的六项标准的内容提了出来,这应当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旦产生,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三纲教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属于父的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奉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十分强调学术自由,“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蠹贼。”

陈独秀提倡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的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陈独秀认为东西民族的思想及其伦理道德根本不同,“各成体系”,“如水火之不相容”。陈独秀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个人本位主义”,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家族本位主义”,“东西文化无任何调和之余地,那些认为可以协调中西文化兼二者之所长是一种彻底的幻想。”“要改变东洋民族之根性,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因此,陈独秀所要求的不是是一事一物的改变,而是整个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改变。因此,陈独秀说:“如不攻破家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宗法思想,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之所期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在我们这里,个人主义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把个人主义说成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实际上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伦理观,个人的智力、才能、兴趣、爱好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应当创造一个自由的条件使其充分发挥,为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

陈独秀特别强烈地攻击民本主义。他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体”。“所谓仁民、爱民、为民的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政治绝非一物”,必须划清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界线,中国才有出路。“希冀圣君贤相施仁政”是“一种奴隶希冀主人发慈悲”,把民本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是对人民的欺骗,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就是主人的共和宪政”,其他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人民“自觉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孙中山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训政,等到人民训政好了,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时,才能把政权交给人民。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只能被赐予民主,实际上是不相信人民,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由人民用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来打倒封建制度,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当然的民主政治的主权的所有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指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向当时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负责联络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张太雷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很生气，拍桌子说：“各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当时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薄弱，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很薄弱，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大部分工人是老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宗法式的，……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工人的数量很少。”“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唯一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马林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为“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权衡对比下，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布哈林决定，马林参与，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

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利，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苏俄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蒋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



“五四”运动(浮雕)

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明天、

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和苏联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都是“退步的”。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不能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我们今天的改革与陈独秀不一样,既要鱼也要熊掌,要两者各得其兼。办法是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邓小平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邓小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行之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太慢,老百姓不满意,就不能巩固。但是邓小平也怕因为引进市场经济而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也顺手牵羊地带进来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关心的是经济,隔几年抓住机会,就上一个台阶,加快发展。当时提出的政治改革,

就是“精简机构”、清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条原则的基础上的。

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亚当·斯密称这是“个人最神圣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这两条原则在改革前的制度体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党和党的干部握有一切决定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干预,改革又把干部所掌握的权力扩大到经济领域中来,进行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从开放市场,成立公司制的第一天开始,财源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者滚滚而来,一个权力者阶层从改革开始就已经成为财富集中的阶层而产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权力财富阶层就更加毫无阻力地发展。

造成这种权力财富阶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三十年也没有改好,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但在国有制企业中,产权是国家所有,但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不可能直接承担法人权利和责任,国有企业的财产由派去的代表负责,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的财产就成为他们挖之不竭的金矿。首先是为自己增加工资,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在一个企业内,工资差别也相差几百倍甚至还要大,因为他们并不怕企业亏欠或倒闭,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自有国家扶持。这还是正常工资收入,至于灰色、黑色收入,化公为私等等就无从计算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有机会捞就不能放弃。过去曾经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富了方丈穷了庙,但是企业困难不用担心,自有国家来解困,国家尽一切条件从各方面向国有企业输血,财政注资,定期补贴,国际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每一次都由国家用政策鼓励其发展,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甚至一个国有企业成了空壳,还能到市场去圈钱,直到把股民的钱袋掏空为止,才算这一轮股市结束。下次再找机会刺激开市,至

于债转股、贴息贷款等等都不在话下，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所能想到的渠道向国有企业输送，再由国有企业流入权力者的钱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是全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血和汗把它扛起来的。

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5月已经突破16万亿元，七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加一万亿。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2006年底，国务院转发国资委文件，作出规定，国营企业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对基础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行业等等。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都要增强。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行业和企业都必须由国有经济进行垄断。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两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超过13万亿，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高度集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至于对私有制，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

还没有提到私有制，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提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行中阻力重重。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据2007年8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垄断已经为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所说，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占GDP的贡献率仍达三分之二，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还是民营经济。

另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出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在我国，出卖土地都是政府机构的扩大，干部的特殊享受，以及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财富向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

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2007年和2008年人大和政协两会的代表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数量更是惊人。

在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从而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改革前那种制度的痼疾。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日益依赖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甚至血汗工资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和国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我国

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内销为主,但是我国这种依赖出口为主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正如前面的分析,是我国改革前的制度所造成的,要把经济的发展改变为以内需为主,就必须把绝对权力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把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改变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种改革是一个方向性的决策,困难是巨大的。

五、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切割开来,马克思是正确的,列宁和毛泽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全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大搞阶级斗争,对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进行全面破坏。然而他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导者。马克思要造成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生产条件都要“控制起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绝对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专制统治下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对西方在人类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才产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所发现的科学、自由、民主,予以全面的否认。原因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里,只有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产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说明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东方的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为巩固这种专制统治的宗法伦理的统治。每次改朝换代都只能由农民革命来实现,那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却根本没有历史的进步。西方的历史发展,无论从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并不是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在不断探索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希腊人发现了城邦民主和个人的自由,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才有希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才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也没有中断过,以至

中世纪的中期就开始了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才有科学革命对自然和宇宙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规律地发现。

原来人类形成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而是在社会中实现相互合作与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和他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人类的任何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个人的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产生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努力。康德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所极力宣传的就是要求实现这样的社会,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而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仅仅依靠体力操作的手工业社会进入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机器生产的社会,再进入现在的以知识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西方国家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灵活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由于这种制度是全面继承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现,才有可能不断调节自己的社会制度,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开拓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现真理、创造真理、推进真理的唯一基础。西方的历史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普遍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先进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 90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公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

● 秦立海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长期以来，人们皆认为此文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然而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因为当时真正让毛泽东担心的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

一、中共对国民党的求和早有思想准备

自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拒绝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1947年10月27日，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与中共联系进行反蒋活动一事，认为这“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步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必须坚持“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停战议和”的“缓兵之计”。^{注1}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斗争日渐激烈，和谈呼声再起。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专门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休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注2}

然而，国民党内的求和呼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揭露和批判而停止，反而日盛一日，迅速发展成一场“和平运动”。到1948年底，就连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副总统”李宗仁，甚至“总统”蒋介石，都在公开“呼吁和平”了。12月2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希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注3}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也在南京制造舆论，主张和平，并要求“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

面对桂系的“逼宫”，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中发表元旦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在此条件下，“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注4}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之后，无疑自撞枪口，明知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仍不得不进行求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驳。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二、毛泽东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将革命进行到底》虽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但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注5}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尖锐问题,主要是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此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已公开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并应中共邀请已经或正在准备进入解放区,但是,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呼声,少数人在此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动摇,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据李维汉回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并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注6}

由此可见,“将革命进行到底”绝非无的放矢,它不但对国民党蒋介石求和活动的响亮回答,更在革命阵营内部敲响了警钟。

三、民主人士明确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各界民主人士的高度关注,随即进行了意见沟通,开始协调政治立场,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19人,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章乃器、朱学范、李德全、茅盾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一、“养痍貽患,萑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严正声明”。^{注7}

1月14日,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

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注8

八项和平条件发表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民主人士的态度与反应,当天便致电东北局,要求“收到这一声明后,应立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召集民主人士进行了座谈,认为:“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份支持毛泽东八项和平条件的声明。

1月17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并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注9

当天,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人前述1月7日来电做出答复:“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注10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与沟通,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强调:“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此外,各位

民主人士还一致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注11

这既是对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做出的明确回答,也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首次明确以文字形式公开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以此为标志,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革命阵营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注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页。

注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

注3 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9页。

注4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4页。

注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4—1375页。

注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注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注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9页。

注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页。

注1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注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2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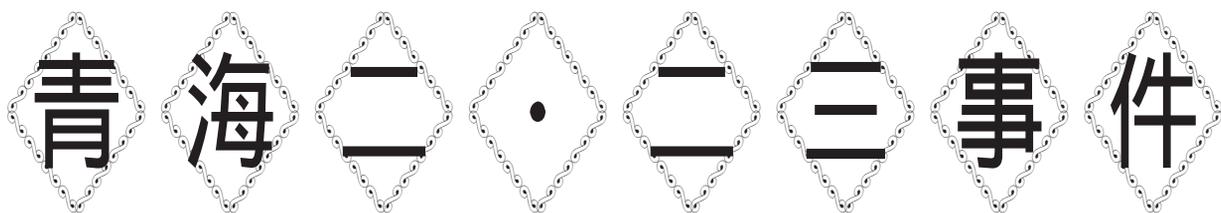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事

《炎黄春秋》1999年至2006年尚有少量刊物(不全)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或前往购买。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城铁四惠东站B口往东20米报亭。

联系人:朱亮,电话:13552967836



● 孙言诚

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四十多年过去了，事件的经过连同死去的冤魂，都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许，只有那些幸存者，还忘却不了心中的痛，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已化作一缕飘渺的轻烟。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

文革中青海的两大派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

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两派群众都是要“紧跟毛主席，誓死闹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那么，党指向哪里呢？

文革发动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矛头应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走资派。为了树立样板，中央下令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的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青海虽然偏居西北，却阻挡不了党的声音，得风气之先的人纷纷起来造党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五名师生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格尔木机关干部给县委贴大字报，民族学院教师傅信给院长贴大字报等等。

造反的人遭到保守群众的迎头痛击。保守群众根据反右的经验，认为矛头指向党委的人就是右派，他们像1957年那样奋起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党也传来了反右的声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面对混乱局面，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

记）。对西北地区，更有具体指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

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

社论一发表，西宁市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学生、干部、工人一拨一拨地涌进报社，高呼

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6月12日,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同时派出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程光远软禁在家,陈逸隔离反省,雷经农反戈一击,一个“程陈反党集团”浮出水面。



陈逸满腹委屈,他认为社论不过是篇职务作品。之前他也曾奉宣传部长之命,写过批黄静涛的文章,尽管他对黄一无所知;写过批“三家村”的文章,尽管他对邓拓还怀有敬仰之心,作为一支笔杆子,他已经习惯了奉旨撰文。这一次明明是传达中央的精神,怎么就奉错了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他打成了“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他经历了一番冰火地狱般的右派生活。

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派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保守群众纷纷倒戈。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10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月底的136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八·一八;省长王昭根据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坚决支持捍卫队。两派均有恃无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12月2日作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

派。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一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

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旬,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

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



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二三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

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

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洗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派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

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派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

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

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

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戚本禹说：“调查会尚未开完，总理就给主席写了报告，总理把报告推给我看了一下，内说：‘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署：周恩来。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我和关锋听了都吃了一惊。这时叶群说：“林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下面引几段对话：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请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大汗）

总理：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总理：2月23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生：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谁下的命令？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也不知道。

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

押下去。王昭在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余波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红灯记》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肆意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人们铭记在心的信条。经历了血的洗礼,青海省两派斗争的激烈,不言而喻。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王昭是1961年派到青海解决饥饿问题的,事后留任省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理顺经济,解民倒悬,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就连写“六·三社论”的陈逸,也说他是难得的好干部。此时沦为二·二三事件黑后台,以带病之躯,被批斗数十次。1970年2月,年仅53岁的王昭,死于南

滩监狱。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头头,不少人在清队、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关进监狱。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1999年10月18日在兰州去世。

当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红卫兵,除少数家长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宁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

(本文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声望听力
好听力 · 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A/B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30029号

毛泽东入党年月考

• 向继东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09 年 3 月 2 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 :1920 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设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 1956 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 1920 年”。

毛泽东究竟是哪一年加入中共的，似乎不必太当真，反正，毛就是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自己在 1945 年筹备党的七大时也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一版，第 291 页）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他入党没有介绍人，入党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

五年前，笔者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炯华作访谈。王先生是李达专家，从事研究二十多年了，著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达评传》等专著。我们这次访谈题为《李达与毛泽东、

陈独秀》，发表在 2004 年第七期《书屋》杂志，就涉及到了毛泽东入党时间问题。

李达从 1921 年 2 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因为是秘密的，开什么会自然没有说明。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 7 月 20 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第一版，第 63、79 页）1957 年“七一”同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李达说到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1962 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又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 C.P. 还是 S.Y.？”毛泽东说：“我们是 S.Y。”李达说：“我们是开 C.P. 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 C.P. 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 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第一版，第 465 页。）C.P. 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 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是很小的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李达的这个说法，还有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可以印证。萧三 1954 年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书印出来了，后因故没有发行。在该书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萧三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时说：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转引自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24—325页)

有关“三十节”的事,据萧三说,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易礼容也有同样的回忆。其实,易礼容1979年9月11日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文章与萧三说的略有不同:

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做三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九十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李达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的共产党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第282—283页)

对照来看,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开会”的大致时间是相同的——一大以后,“开会”的地点

和形式也是相同的——协操坪、树林下,边走边谈,只是参加人数多少各人回忆不同。但不影响得出这个结论:湖南党组织是一大后建立起来的。

1920年,毛泽东到底忙乎些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但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附篇《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一年,毛泽东除了到北京、上海跑了一趟,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两本外,主要做了以下这些大事:一是成功地推动“驱张运动”(“张”即“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百度上搜索的“张敬尧”词条说,张“因遭到当地军阀、土豪的反对被迫辞职”,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二是创办湖南文化书社;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反对统一》等多篇文章,主张制定“湖南宪法”,建立“湖南共和国”;四是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就有较详细的记载,说“毛泽东积极地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对象。”当时,第一师范有个叫张文亮的学生(后来这个学生并未参加革命,成了神经失常的人),接受了毛泽东建团的任务。他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这本日记是从贺尔康烈士家中得到的),简略地记录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最确切的记载”。以下摘自张文亮的日记:

1920年9月10日。至通俗教育馆,通俗报明天出版。何先生(按:指何叔衡)要我投稿,我已当面允诺。

回师范,晚与毛泽东谈事颇多。

9月25日。昨日泽东哥来邀我,今天下午赴游江之约。抵文化书社,会见杨开慧君。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按:即萍乡之行),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

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7日。到文化书社见泽东、殷柏。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转引自《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9页)

从以上日记可见,这几个月毛泽东用心最多的是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时也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建共产党。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说:萧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页)毛

泽东“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大家并“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7页)所有这些都表明,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即便毛泽东自己填写了,也只是孤证。(责任编辑 吴 思)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大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按需出版

2004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300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重印在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 (50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基本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目

睹

新

中

国

开

国

大

典

郭
英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永远被我们和后人铭记的日子。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回忆起半个多世纪之前,我目睹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时一桩桩一件件激动人心的盛况,依然是兴奋不已。

1949年北平刚一解放,我就随军进城并作为筹建新中国的工作人员,首批进驻了中南海。起初,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中南海办事处接待科科长,具体任务是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就转任筹备会庶务处招待科科长,具体负责会议的招待服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上级任命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科科长兼国家典礼局秘书,参加筹备开国大典,并和副科长李钊同志共同负责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接待服务工作。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开国大典这一永载史册的伟大画卷,有幸经历了大典准备工作中许多鲜为人详知的事。

要比较全面说开国大典的情形,必须从1949年6月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说起。正是新政协于9月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次政协会议之所以冠上一个“新”字,是针对“旧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的。原来根据《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国民党于1946年1月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国共两党外,还有民主同盟等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共39人。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各党派组建联合政府等许多重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撕毁一切协定,大打内战,并召开伪国大,企图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愿望,于1948年5月1日发出号召,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共23个单位,共134人。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随后,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国人民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成立新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人民这个希望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李立三、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马叙伦、马寅初、乌兰夫、章伯钧、张澜、张奚若、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黄炎培、蔡廷锴、蔡畅、谭平山等21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办法,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新政协筹备工作就绪后,9月21日下午7时,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产业界民主人士的代表、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宗教界民主人士代

表、特别邀请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共 662 人，欢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毛主席讲话不多，但充满激情。他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之后，就以东方巨人的气概，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接着，他又满怀豪情地展望未来：“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在世界。”

当时的会场之上，人人心情激荡，笑逐颜开，一阵接一阵的雷鸣般的掌声，像是要把整个怀仁堂抬起来。毛主席的这些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令我振奋不已。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9 月 27 日全体会议上做出了一项重大决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纪年按照国际通行的公元纪年法。

《人民日报》记者对这次会议报道说：“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终生都不会忘记那六次举行通过的庄严盛事。当时人们热情沸腾，水银灯和日光灯明白如昼，会场上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力量和光明。每一个议案通过时，代表和来宾一致热烈鼓掌，庆贺胜利。记者把各种重要场面都摄入了镜头，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看着他们的先人们是如何开基立业的吧，他们会珍惜所得的遗产，使之发扬光大。……在今天的会议上，升起了新中国的国旗，红底黄星，庄严美丽。他是我们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象征。在世界上，他会代表着伟大与光荣。每一个‘身在异邦，心在祖国’的侨胞，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义勇军进行曲》即为我们的国歌，十几年前，他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战斗热情，今后，他将鼓舞我们继续胜利前进，建设一个幸福的新国家。”



新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9 月 30 日隆重闭幕。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选举了国家领导人。投票之后，毛泽东带领全体代表乘车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为从 1840 年以来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志哀。

奠基仪式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并致词。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 年 9 月 30 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周恩来致词之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致哀之后，毛泽东走出行列，亲自宣读他亲自起草的、大会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内容是：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宣读碑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让我们高呼:“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大会在高昂宏亮的国歌声中闭幕。

为庆祝会议的成功,当晚在怀仁堂大厅举行了盛大国宴。周恩来满面春风,高举酒杯,朗声说道:“为新中国干杯!”毛泽东和所有代表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整个宴会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一件激荡亿万中国人民和一切

爱好和平人士心田的大喜事,也是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开国大典的所有准备工作,一直都在紧锣密鼓、严肃认真地进行之中。

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科,负责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所有贵宾的接待服务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深知责任重大,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各项工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

首先是开国大典的地点、设施的整修问题。举行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大典的人数要达30多万。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原是明、清两代皇城的前院,是一个封闭式广场,大小只相当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分之一(原为11万平方米,现在是44.5万平方米),两侧还有高大的围墙,东西南三端还各有一门,俗称“三座门”。此外,广场上不仅没有现在平整的地面,而且到处是垃圾和破砖烂瓦,30万人难以容纳,也难以游行。不过,这难不住解放了的北平市的人民,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腔热情地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自带干粮,昼夜兼程,肩挑手搬,很快把广场杂物清走,打扫干净,使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解放不久的天安门城楼已是破旧不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片狼藉,不堪入目。在清理城门洞时,还在西门洞里发现有炸弹,工地负责人慌忙报告了张致祥同志(当时为华北军区政治部

北平市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将一把拴有红绣的铁锹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第一锹黄土撒向基石,其他领导和代表们也一一为纪念碑铲土奠基,表达对先烈们的缅怀、崇敬和告慰之意。

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之后,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返回怀仁堂会场。这时,选举揭晓: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当选为政府委员。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宣言。宣言庄严地宣告:“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民现在是站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新中国从此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时,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了怀仁堂,响彻了中南海,并且通过无线电波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当时的场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终生难忘!会议最后,由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他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法。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都符合于人民的意志。在

副主任兼宣传部长，负责大典的宣传和群众工作)。张致祥同志忙请上负责安全工作的罗瑞卿同志一同查看后，见是一颗废旧炸弹，大家才放了心。当时的能工巧匠们也是加班加点，在大典之前把城楼清理、整修、装饰一新，在城楼挂起十个大红灯笼，城楼楼顶正中，高高悬挂起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彩色画像；城楼两侧是两块巨幅标语，一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侧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后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值得一提的还有天安门前观礼台。当时外金水河上可没如今这样坚固壮观的观礼台，也是一片废墟。为了能使众多贵宾观礼，北平市的能工巧匠们就用搭大棚用的杉杆、竹竿、麻绳、铁丝，在天安门两侧的外金水河前，搭起了两座观礼台。负责此项工作的张致祥同志担心不结实，还调来华北军区警卫营的人，一齐上去，一齐喊“一、二”，一同跺脚“实验”。结果证明“万无一失”，才交付使用。事后张致祥风趣地说：“开国大典的观礼台要是‘垮了台’，那还得了！”

1949年10月1日，是我最激动、最紧张的日子。这天下午2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得简短明快。正、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就职后，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即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即西苑门)，进入北长街南头和南长街北头之间的横街，直对西华门，然后穿过阙右门，来到天安门城楼的北面；下车后，便沿着天安门北侧西边、用大城砖砌的百级台阶，登上了天

安门城楼。

毛主席的前脚刚刚踏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个台阶的刹那间，军乐队立即高奏起《东方红》乐曲；天安门上的播音器中，也立即传出了播音员清脆悦耳和激动兴奋的声音：“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啦！”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和广播员的广播声，天安门城楼之上和天安门广场之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号声。

这里应当顺便交代一下的是，毛主席是从天安门西侧登上城楼的，而军乐队是站在城楼上的东侧，根本看不见毛泽东登上城楼的情形，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些现代化的电讯电传设备；为什么毛泽东前脚登上天安门城楼，军乐队就能立即奏起《东方红》乐曲呢？这件事原来是负责组织这项活动的张致祥同志和军乐队指挥罗浪同志“巧妙”安排的。张致祥和罗浪约好，由张致祥事先站在城楼西侧一眼就能看到毛主席登上城楼的地方，他见毛主席的前脚一踏上城楼立刻晃动手中的红旗；罗浪一见红旗晃动，立即指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佩戴着用红色锦缎制作的、剪成燕尾状的飘带，飘带上面用烫金字竖写着佩戴者的职务和称谓，他们的服装样式、色调虽然各不相同，但鲜艳夺目的丝织锦带



1949年10月1日，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胸前一戴，一个个都更显得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但跟随毛泽东的叶子龙同志（当时毛主席的秘书）突然发现：毛主席胸前的飘带，不知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大吃一惊。因为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和贵宾，人人都戴着彩色飘带，唯独主持开国大典的党和国家的主席没有戴飘带，这怎么可以！这时，离大典开始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怎么办？还是钟灵同志（当时的布置科科长）有办法：急忙驱车返回中南海，用锦缎又制作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飘带，并用胶水写上“主席”两个大字，然后洒上金粉，使这一飘带更加美观大方，而且更加光彩夺目，并赶在大典开始之前，挂在了毛泽东主席的胸前。

这时，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30多万观礼群众。他们一个个手持红旗，身着节日盛装，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天空蔚蓝如洗，阳光明媚，红旗飘扬，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世界，幸福的海洋。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城楼就位。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乐队高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地走到麦克风前，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紧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新中国的首都缓缓升起；与此同时，在嘹亮的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30多万人爆发出一个共同的、响彻云霄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接着，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特大喜讯。

随后是盛大的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敞篷汽车出现在天安门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总司令敬礼报告：“各军兵种已经准备完毕，待命接受总司令检阅！”在聂荣臻陪同下，朱总司令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朱总司令检阅完毕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朗声宣布：“阅兵式开始！”

随着朱总司令一声令下，在刚健嘹亮的军乐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各军兵种指战员，

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接受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检阅。抚今追昔，当年的“土八路”，如今成了装备整齐、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受阅队伍进入“三座门”的东门之后，即正步前进，更加威武；到达天安门主席台前的东侧时，在一声“敬礼！”的口令下，指战员们一个个英姿飒爽，整齐划一地侧面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同时行持枪礼，更显得英气十足。当十几架银色的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主席台上下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热烈欢呼新中国空军的建立。

阅兵式过后，群众队伍开始游行。群众游行的场面，尤为壮观。30万人通过天安门前，个个激情满怀，人流滚滚如潮，红旗漫天飞扬。经过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前时，人们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有的则停下了脚步，不少人甚至涌向金水桥边，翘首提踵，想把毛主席看得清楚一些，多看上几眼。人们知道：是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当晚7时，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又来到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人民群众一起共度良宵，观看礼花。天安门夜景迷人。天安门城楼的巨大宫灯和天安门下千万盏红星形的灯笼，瞬间点燃，无数绚丽耀眼的焰火，从广场四周飞向夜空。真个是“火树银花不夜天！”

当参加欢庆的群众见到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无不纵情欢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也十分激动，他从城楼东侧走到西侧，又从西侧走到东侧，一边举帽挥手致意，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庆典结束时天色已晚，毛主席回到中南海刚一下车，就收到斯大林给他的电报，向中国共产党祝贺，宣布苏联承认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明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毛主席拉着叶子龙的手非常高兴地说：“好么！好么！”

60年弹指一挥间。新中国领导人在开国大典上的举止神态、音容笑貌，和广场上数十万人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盛景，依然历历在目，如同昨天，一桩桩一件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责任编辑 致 中）

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二事件现场

● 阎明复

今年7月,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托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

顾大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又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要职,在华工作长达12年,曾亲历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以及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

1957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我和古达舍夫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青的苏联人,特意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顾大寿”。我与顾大寿从那时相识后,又多次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

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难忘的中国生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波作了客观真实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和名人轶事。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9·13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71年,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传说中共内部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免去了一切职务,最后死在开封市的一所牢房里。邓小平和中共其他的高层领导人被放逐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同时,国防部长林彪成为中国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挑选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点写在中共党章中。可是林

彪不只一次地向毛泽东建议恢复中国国家主席的职位,对此,领袖的反应极其否定。

“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对林彪的信任。不仅如此,毛泽东已经考虑,如何结束‘文化革命’。因此,他秘密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以便实地了解情况,在同各军区领导人吹风时,他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统一的必要性,林彪和他的拥护者,包括当时担任高官的林彪的夫人叶群,他的儿子林立果,力图篡权并分裂中央。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他的拥护者在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暴露后,企图逃跑。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были сбиты)。这就是所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我喜欢乘坐火车,因为从车厢的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景色,比坐飞机安全多了。而从飞机的窗子里只能看见天空。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

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都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于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死者中有一位妇女,她可能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巴兰诺夫将军给我们看了死者的照片,照片和烧焦的遗体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莫斯科发来电报,允许把估计是林彪的头颅以及部分有研究价值的飞机残片送去,其他的死者和飞机的残骸又重新埋起来。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的武官派了专人,把林彪的头颅和部分飞机零件运到莫斯科。

“完成任务后,我和我的两位同志依旧乘坐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后来听说,林彪的头颅很快送到莫斯科,苏联有关机构做了牙齿鉴定,很快就得出了结果,证实这些牙齿是属于林彪的。至于说为什么林彪要叛逃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飞机的坠落和爆炸,莫斯科没有给我们任何说明。新华社也没有发表任何材料。

“过了一个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讲述了林彪的叛逃经过,然后《通知》又作为正式文件在党外、在居民当中进行传达。其中指出,林彪伪装并欺骗了毛泽东,命令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成立了一个小‘舰队’,想要实现‘571工程’,



策划政变,夺取政权,甚至于想要杀死毛泽东。至于说为什么逃亡国外或叛变,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说他企图出卖祖国,并在准备在自己今后的破坏活动中依靠苏联。这加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和领袖的热爱,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中国人民被林彪的行为激怒了。

“在北京,我不只一次地亲耳听到对林彪反党行为的谴责。

“当年林彪曾在苏联学习,并表现出了军事才能。这一点斯大林特别指出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普通的人。林彪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喜欢讲话。毛泽东看中林彪,还在1955年授予他元帅军衔。在中国的10位元勋中,他是最年轻的。1958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统帅三军武装力量。

“1959年,当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活动时,在北京机场上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了仪仗队。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人当中他排第五位。‘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接替了刘少奇,成为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当时毛泽东被称为最高统帅,他被称为副统帅以及毛泽东最可靠的接班人。他如此迅速地高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当时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林彪会在异国他乡,在沙漠中如此悲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9·13事件”过去已经近30年了,至今似乎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责任编辑 吴 思)

大跃进中亳县干部作风问题记述

• 梁志远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三年大饥荒中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干部作风恶劣，是一个重要原因。1960年冬至1961年春，亳县是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县之一。事实证明，哪里的干部作风好，问题就小一些，哪里的干部作风不好，问题就多就重。根据查阅自己三年的工作笔记和亲见、亲闻以及查证有关历史资料，对干部作风记述如下：

干部作风的大致区分

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全县干部作风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好的。在大轰大嗡和大饥荒中，他们敢于实事求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当地实际情况或批评某些领导的恶劣作风。这样的干部一般都遭到残酷的打击。分别受到批判斗争、纪律处分、戴上政治帽子、逮捕入狱等。有的被迫自杀或被迫害致死。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面对种种高压，他们不怕个人风险，忧国忧民，想方设法抵制“五风”。如搞责任制、小队分配、冒险少量藏粮等，从而减少农民死亡；他们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亲人谋利，不给亲人多吃多占，从而失去了亲人或自己死于饥饿之中；认清形势，排除干扰，他们把农民生活放在首位，积极带领群众采取各种自救措施。如1959年秋抗旱早种大种胡萝卜、蔬菜、大白菜等，有效地减少农民的死亡。有的视病人为亲人，在工作中为病人送医送药，倒屎倒尿，想方设法抢救危重病人，从而做出显著成绩。正因为有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好医生、好教师，他们虽不能左右整个形势，但也挽回了一些农民生命财产的很大损失。这些人被农民视为恩人。

这样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就不饿死人或少饿死人。如张集公社小陈庄、城父公社小南庄等一些生产队。

二是比较好。这是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在“大跃进”中，怕当右倾，怕犯错误，怕落后挨整。因而唯上是从，跟着跑，随着吹，但少出或不出残害农民的新花样。本人虽有一般多吃多占，管辖区内虽然饿死人，但能积极抓生活搞生产，没有打骂残害群众等恶劣作风，所以取得群众谅解。

三是问题多的。工作中大吹大擂，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同时认为死几个人算什么，只要不犯右的错误就好。因此大刮“五风”，欺上瞒下，多吃多占，残害农民的花样较多，后果较严重。

四是性质严重的。这种人无法无天，不顾农民生死，大刮“五风”变本加厉，残害农民的花样百出，欺上压下，胡作非为，亲手或唆使他人直接残害群众，后果特别严重。同时大吃大喝，贪污盗窃，一贯堕落腐化等。

干部作风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大吹大擂，大反右倾，表彰浮夸，打击说真话的人，严密封锁饥荒消息。在生产、生活和各项工作中，大放“卫星”，购过头粮，迎合领导心理，克扣农民的口粮，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这些行为给予表扬、奖励、重用、提拔。而对实事求是者施以批评、辩论、批判、斗争、戴政治帽子、劳教、逮捕、判刑，甚至迫害致死。

有这些表现的干部和社员受到重点打击：反对三面红旗、粮食惜售、农民

“吃青”(粮食尚未成熟收获前采吃)、反映饿死人和人吃人等。

封锁消息,已成为上下通病。县委对中央派人来毫检查农民生活,均由县委一二把手亲自安排有关部门和人员接待,要求不准暴露死人、浮肿、外流等情况;对向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的人民来信,按省委办公厅的绝密通知规定,一律由县邮局拦截转蚌埠邮局“袁柏亭”收。对人吃人的“特种案件”,只准政法部门严办,禁止任何人泄露“机密”。在两年中,没有一个公社正式向县委如实报告过一次死人情况。观堂公社余里大队余西分支书记1960年春,对群众下达命令三不准:①死了人不准哭;②死人埋坟不准高出地平面;③群众不准接近检查组。

二、严重强迫命令。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只要领导一声令下,社员就要绝对服从,稍有迟疑,即遭严惩。1960年8月城父公社小杨大队在农民饿死40%左右,却强迫群众集资买胡萝卜种子,社员景林臣因无钱集资,大队青年书记逼迫景将其饿死已埋的母亲的大棺扒出、抛尸取棺,卖钱上交。由于尸未化尽,臭气熏人,无法出卖,将棺抬河里泡着。1960年9月30日,县委检查组发现,棺木仍泡在河里。该公社张营大队1960年8月20日决定要从各生产队调劳力在常庄办大队农场。全庄32户,除了与干部亲近留场3户以外,其余29户要全部搬家出村。事先既没有通知群众,又没有通知搬入村解决住房。一宣布营(大队)里“命令”,就要群众立即搬家分散到几个村去。搬后天下大雨,群众的東西在外淋着,不少人大哭大叫,干部不予睬理。有几户私自回去的,被大队干部关锁屋里饿一天一夜后,仍强迫搬入指定村庄。有的户回去采摘自己原在家前屋后种的瓜菜,被视为“偷盗”被关押起来。

三、干部生活特殊,多吃多占,克扣农民的口粮。在大饥荒出现之后,操有实权者,从县委到生产队干部(包括干部亲近等)多吃多占成风。1960年农民口粮日人均不足半斤的时候,一般生产队干部等就要吃掉农民口粮10%—20%,县、公社、大队克扣的粮食加起来超过这个比例。

四、扣饭、收锅、砸锅。农民饥饿无奈的情况下,粮食成熟之前到地里“吃青”。生产队把扣饭、收锅、砸锅成为惩治“吃青”社员的“绝招”。全县

因扣饭致死或因扣饭自杀者屡见不鲜。如1960年8月27日,五马公社草寺大队段门楼生产队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而扣饭,被迫上吊自杀。有的锅被收走或砸坏,别说没有钱,即使有钱市场上也难买到新锅,农民就用破搪瓷盆、铁盆等煮野菜吃。十九里公社有一名男子,锅被收走之后,用军人旧头盔烧饭和到食堂领饭。

五、对农民乱捕乱押。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冬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为止,是全县关押“犯人”最多的时期。

据1959年秋,县委反右倾时统计:1959年3月7日至9月18日,在押314人中,竟有一般干部批押的30余人,其余200多人不知都是谁批押的!反右倾之后县委政法部成立,批捕范围扩大了,1960年秋,全县又大抓一批“吃青”农民。政法部门在魏岗公社牛集大队搞反偷盗重点,一个早晨就逮捕“吃青”农民和小偷小摸9人。在抓押人中,教育释放的少,劳教、判刑的多,关押致死的也不是少数。据在劳教的犯人大组长丁×(已平反)说:1960年在城隍庙劳教所200余犯人中,饿累而死者,约有40人左右。

公社大队的“火箭营”“火箭连”,实际是社队具有综合专政职能的特殊机构。这里设有审讯室、牢房,有持枪民兵站岗,戒备森严。在1959年反右倾和整风整社及粮食收获季节,“吃青”农民多的时候,只要公社书记、社长、政法部长等人一句话,不要任何材料就可抓、关、捆、绑、吊、打、铐、关进火箭营连劳动改造。在几年的乱抓乱押中,全县在“火箭营”、连关押最低人数为5000人,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当时农民私下传的顺口溜说:“社队都有公、检、法,有错没错都能抓,捆绑吊打是常事,死了叫你抬回家!”

全县设立的“劝阻站”,是阻止饥民外出逃荒的机构。“劝阻站”实际变成了“拘留所”。1959年冬,“劝阻站”在全县星罗棋布,大队已无空白。被查扣者有的一扣就是多日。县“劝阻站”在城西北南京寺西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从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抽10余人专门管理,有持枪民兵站岗。劝阻站大门紧闭,还备有绳、棍、铐子、枪支等。在“劝阻站”里,捆绑打铐常有发生。常有人死在里面。1960年春,我去县站检查过两次,被扣的均有近百人,除一部分人可以在院子劳动外,有一

部分人被关锁在屋里,有的能扣留几个月。

六、殴打残害农民,大量农民受干部摧残,略举如下:

——1960年8月23日城父公社党委给我的电话汇报说:公社党委副书记,1959年冬至1960年8月在庞洼大队驻点,用以殴打治服群众办法去开展工作,“吃青”者打、不服从领导的打、好提意见的打、与人闹不团结的打、完不成任务的打、上工迟到早退的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约打200人次,其中也有打后死亡的。

——亳县粮食局原局长,1960年春,到张集公社小柘大队,见到农民刘维亮因饿而偷吃红芋种,被抓住后,该局长亲自拳打脚踢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检查汇报:1960年春,一姓何的十三岁的男孩,因偷小羊吃,被张集公社芦庙大队王楼支部书记亲手打死。埋葬后,该支书怕因坟墓被人看到,暴露自己的罪行,而特派入将坟耙平。

——据受害人亲口反映:1960年麦收前,十河公社佟营大队门庄支部书记,对“吃青”农民进行搜身、搜家,翻箱倒柜。对搜翻有青麦者佟广英等近20人均被定为“偷盗”,全部抓走,集中在一个麦场上,跪成一排。该支书用皮鞭,对身穿单衣的农民,逐个反复抽打,一鞭一个血印,被打得东倒西歪,哭嚎乱滚。该支书凶狠狠地说,再偷要比这打得还狠!40年后受害人及其亲人们忆此悲惨,仍痛心难过。

——据1960年10月《县委万人大会卷》181页记载: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生产队长,自1960年春至10月,共吊打农民19人,其中被打后逃走3人。农民田心亮因饿体质很差,派活未去,被该队长连踹20多脚,第二天死亡。农民夏耿氏因痢疾下地干活少些而扣饭,被逼上吊自杀。该队长1960年2月至3月中旬,利用食堂馍饭为诱饵,非法“娶”了三个老婆。

——据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1960年3月18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由大队长带领百余农民到离家30余里的大杨公社于王大队挖茅根(代食品)。因天下大雨,无法挖刨。该大队长强令群众返回,身弱怕淋的农民不愿回去的被打20余人。在冒雨回乡群众中,途中因打、冻、饿而死者4人。

——1960年12月6日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汇报,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孙家法前往复查,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周瓦分支和生产队干部,对“吃青”农民施用残酷的刑罚。一是“拧螺丝”。即用一双竹筷子,双手夹紧“吃青”农民的肚皮,用力猛拧,以致拧成血泡、血穴、紫肿等;二是“炼脚板”。即令“吃青”农民光着脚,用棍打着在蒺藜窝里跑步,扎满脚板蒺藜,以致不能行走。

——城父公社城父大队小刘庄支部书记,全家人到小刘庄多吃,一惯打骂群众。1960年春到任一个多月,打10多人,其中14岁女孤儿刘贞,不仅腿肿开裂不加过问,反因她到地里吃青麦被打后而死。女社员刘氏43岁,全家六口人已死四口时,求食不予睬理,本人于5月4日死亡。3月份全庄仅有149人了,到5月5日又死亡52人,(3月前死人统计)占34%。该支书竟公开说:“就是死200人又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你们死完也照样搞社会主义。”

——用铁丝穿“吃青”农民耳朵最残酷的事件也在亳县发生。

——对“吃青”农民捆、绑、吊、打、冻、晒、罚、饿、前铐、背铐、油漆画花脸、爬蛤蟆、游街、游村、游工地等,已屡见不鲜。

在反农民“偷盗”防“吃青”中,污辱残害妇女事件,全县多处发生。

七、贪污盗窃 堕落腐化。在这场农民大批死亡的大灾乱中,有的干部乘机混水摸鱼,贪污盗窃,堕落腐化。

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1960年春盗窃农民口粮卖私馍,对农民采取扣饭,全村死人比例大大超过邻队,庄西半部的21个劳动力全部饿死。并奸污妇女10余人;该公社庞洼大队副书记,亲手盗卖农民口粮(红芋片)300斤,在黑市高价出售。这300斤口粮则直接夺去了多少农民的生命?除此之外,他还奸污妇女10余人;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支部书记,1960年3月—4月宰杀集体生猪7头,连吃带卖,贪污肥己。同时他亲自不断在几个食堂对农民扣饭,被他扣饭后而死农民就达11人之多。该支书从1955年至1960年共奸污妇女6人。

在县社主要负责人中,有不少人一惯堕落腐化。除县委书记处书记外,13个公社中竟有5个

公社党委第一把手,因堕落腐化而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安徽省委对亳县的“五风”严重后果早有发现,1960年7月即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同志带工作队进驻亳县。但由于极左路线仍占上风,工作队仅抓了一般性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少数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此后对粮食高估产高征购的追逼依旧,秋冬农民非正常死亡和浮肿、外流继续发生。12月上旬农民继续大量死亡的情况发生后,才惊动了省委领导。省委负责人亲临亳县,严肃追查了亳县的领导责任。停止了粮食高征购,落实了粮食回销,1961年6月,农村食堂停伙,实行“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并由大队定期支粮到户,到春节前死人基本停止。与此同时还实行了如下政策和措施:

一、加大整风整社力度。省地县三级进一步增加了整风整社运动的力量,工作队达到600余人。除到5个三类公社外,并抽少数领导力量分赴各一二类公社帮助自查自纠。

全县整风整社运动,通过深入发动群众,揭批了坏人坏事,全县干部共分为六类,在五六类人员中属于问题情节严重和有历史问题并直接致死人命的划为敌我矛盾。全县在188个大队中,被坏人占据领导岗位的有34个大队,占18%。其中被封建反革命占据领导岗位的有5个大队。全县共揭露出5、6类分子1234人,占干部总数的5.3%。在犯有各类严重错误的干部中,一般都交群众批判、斗争后分别由县社集训。据1961年4月16日统计,县集训1336人,公社集训906人。并采取了边集训边定案处理。分别给予逮捕、劳动教养、纪律处分、放回生产。

二、对农民实行劳逸结合。保证农民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使农民恢复“五风”摧残的创伤。特别是停止了对农民有巨大压力的全民大办水利和旱粮改种水稻等强体力劳动的农活。农民体质逐步恢复。

三、设区分社,缩小社队规模。把原来13个人民公社188个大队1345个生产队,改为12个区62个公社512个大队6132个生产队。接着贯

彻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下来。并建立健全分配和财务等各种制度,被“共产风”刮走的农民财产,进行了象征性退赔,并发还了社员自留地。鼓励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和饲养大牲畜。准许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四、推行了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安徽省委面对农村两年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实际,进行了“责任田”的试验。并经毛主席首肯试验和推广。亳县积极响应省委推行“责任田”的号召,于1961年3月试点,7月全面铺开。农民有了“责任田”,如鱼得水,充分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在耕畜、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解决了生产大轰隆,当年粮食获得明显增产。社员多劳多得。由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农民生活好转,从而大大改善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安徽的“责任田”结论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而被取缔。生产又回到大轰隆的老路上去。人民公社的体制,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9月,以社改乡的政策由家庭联产承包所取代。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33页)道,工作队对她很感头疼。于是,工作队便引导王作军,动员王作军说是受李瑞莲指使写的,把责任转嫁给李瑞莲,借此整服她。王作军不愿意做昧良心的事,工作队的意图始终没能实现。结果,王作军被关了一个多月。在那些日子里,三婶子(王作军的母亲)每天一天三顿给儿子送饭,一只手提着一个盛着稀饭或南瓜菜的小饭罐,另一只手拿着用家织布做的毛手巾包的两个锅饼。虽然最后没有给王作军带上什么帽子,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拿这一档子事来压他,等于半个“阶级敌人”。受这件事的影响,王作军也没有娶上媳妇,也在吃着“五保”。

到了“四清”结束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小的生产队已经有了八个半“阶级敌人”,除王作军外,他们都戴帽子受管制,经常挨批斗,还要随时被叫去干义务劳动。

(作者为徐州师范大学附中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 李世华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我们队里最高的成分,其余的都是贫农、下中农。

大饥荒刚过去,社员们才吃了两年饱饭,过了两年安生日子,1964年“四清运动”又在我们家乡开始了。于是乎,平静的农村又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波澜。

这时,我们生产队并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成分最高的欧四奶奶也只是上中农,并不是专政对象。但工作队一进村便看上了欧四奶奶家的浑砖到顶的瓦房,七算八算欧四奶奶家够上了“地主”的杠,便认定她们家是“漏划地主”,遂把她们家的成分改化成地主,欧四奶奶和她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已死)、四个儿媳妇全部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她的十几个孙子、孙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这样,我们生产队便一次“挖出”了七个“阶级敌人”。欧四奶奶被赶出她的院子,工作队住进了她的瓦房,外间是工作队办公室。这时,欧四奶奶最大的孙子

欧林广刚刚结婚。新婚媳妇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类”和“黑五类子女”,料定一生没有好日子过,在婚后第九天拿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后也再没有人愿意嫁给这个“地主羔子”。待到后来取消了阶级成分,欧林广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直到今天欧林广仍然是光棍条子一个,在村里享受着“五保户”待遇。

工作队在我们第四生产队另外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毛传明。虽然毛传明家是贫农,但据说他有历史问题,生活困难时期,他偷过队里的南瓜,又搞“投机倒把”,把家织布弄到外地去换粮食,所以被定成“坏分子”,成了我们生产队第八个“阶级敌人”。毛传明有点不服,工作队便组织开会斗争他。有一次斗争毛传明的时候,有人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大石头(北方农村用来舂谷类皮壳的石具)套在毛传明的脖子上,绳子勒进他的肉里。

为了批臭毛传明,工作队组织青年人写大字报揭发他的问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军算是队里的小知识分子,被安排在大字报组。他们挖空心思回忆毛传明的问题,经常熬到深夜,弄得头脑昏昏沉沉。一天深夜,王作军写完了大字报,想以“打倒毛传明,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作结,却神使鬼差地写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毛传明”!王作军立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对象,于是乎,我们第四生产队又多出了一个“阶级敌人”。王作军当晚就被扭送到公社,关进专政机构。

但,王作军毕竟是贫农出身,也没有其他问题,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此时,欧四奶奶的二儿媳妇李瑞莲一直对工作队把他们家补划成地主有意见,常发牢骚。李瑞莲有文化,能说会(下转 32页)



五保户王作军孤身一人过着凄凉的生活(2006年10月摄)

今日李瑞莲已垂垂老矣(2008年4月摄)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

· 徐云根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晶、先进等，他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独秀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新思潮的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他们两人不但都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先驱，还同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并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和代理书记，他们曾经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并肩战斗，忘我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对某些建党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而产生分歧隔膜，更由于性格方面的差异最后关系破裂，令一方负气退出由他们共同亲手创立的党组织。这给我们党的组织和李汉俊本人造成重大损失和终身的遗憾，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和深思。

一、合作：为了相同的目标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所有进步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救国之道，都在思考怎样改造中国这个问题。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这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越发明显的时候。而随着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在日本开始成立。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亦成为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研究和传播的内容。身在日本的李汉俊阅读了当时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李汉俊盛赞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现时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7月，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后回国，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1919年6月，被称作当时“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之一的《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不久李汉俊加入了《星期评论》社，并很快成了这个刊物的核心之一，《星期评论》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1919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所著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连载，文章热情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之方向。他在译后的几句话中写道：“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切有切实的打算。”此时，李汉俊已经萌生了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此时的陈独秀已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已经彻底放弃了“国民运动”的口号和社会改良论，他认为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

题只有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进化最有力的方法，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而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必须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说：“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的表现到政治上只是政党。”还说：“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和指导者不可。”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便与李汉俊取得了联系，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很快使李汉俊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亲密战友。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由北京来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建党的问题。在沪期间魏金斯基访问了《新青年》和《星期评论》等编辑部和一些进步社团负责人，并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李汉俊与陈独秀每次都参加了座谈，他们认真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介绍。通过商谈，陈独秀和李汉俊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加快了建党的步伐。这年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李达、陈公培、沈仲久、刘太白、沈雁冰、杨明斋等人，之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为建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上，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李汉俊则为新成立的共产党起草了一个类似党纲的文件。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李汉俊和陈独秀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党组织用“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

李汉俊两人共同校对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很快该书成为各地党员学习的重要参考书。此外李汉俊和陈独秀还分别与各地的马列主义者或先进分子联系，积极发展党员，成立各地方组织，陈独秀通过关系先后发展了湖南、山东、广州等地党的组织，李汉俊发展了湖北党组织，介绍了董必武等入党。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推动各地建立党团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帮助筹建各地党组织的同时，还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1920年4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还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他说：“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贵”。他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5月1日，李汉俊与陈独秀联手在《星期评论》、《新青年》同时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强盗阶级底成立》，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秘密。8月15日他们又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该刊是我党最早创办的工人刊物，被誉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10月3日，上海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开发起会，李汉俊和陈独秀一同蒞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

1920年11月，陈独秀因陈炯明邀请到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上海后，便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同时将《新青年》杂志也交给他和陈望道主编。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的信任和看重。这段时间无疑是李汉俊和陈独秀关系最为密切和融洽的时期。

二、隔膜：因分歧和经费而起

陈独秀赴广州工作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由李汉俊任代理书记。李汉俊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方面夜以继日地编



李汉俊(1890-1927)

陈独秀(1879-1942)

辑《新青年》杂志。在这期间李汉俊与陈独秀之间产生了隔膜,产生隔膜的原因是他们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性格上的差异。

李汉俊与陈独秀政治分歧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中央是采取“分权”还是“集权”的问题上。原中共上海发起组主要成员之一的李达对此回忆说：“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陈独秀对李汉俊也很不满意,陈独秀对从上海前往广州的包惠僧说:“我要搞中央集权制,他要搞地方分权制,这不是明着与我对着干吗?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

不过在李汉俊等人的抵制下,陈独秀只得做出让步,在中共“一大”前,他在广州又匆匆起草了一个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发动群众。”新提案由广州代表陈公博带到上海,这个提案实际上成为中共“一大”的指导原

则。如果把陈独秀提出的这个提案与5个月前寄来的“党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党章”上的“民主集权制”被改成了“民主主义之指导”,还把“党章”上的“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改为有较大解释余地的“纪律”。在“一大”会议上,李汉俊再次提出“不赞成组成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对此,张国焘在会后大发牢骚,责怪“陈独秀搞的党太松弛”。当然,李汉俊的“分权”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李汉俊认为中央只要一个人坐机关就够了,各地的政策也不宜相同。很明显,李汉俊的主张违背了列宁的“中央集权制”的建党原则。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李汉俊还曾提出,在现阶段,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这一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也有支持者,但大多数代表却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结果会议通过的党纲和决议指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张国焘曾经回忆说:“在开会以前有两个意见:汉俊与守常等是一个意见,国焘与独秀等是一个意见。”“与无政府党争斗,守常也有些动摇。但独秀对这些问题当能坚决,对我的意见表同情。曾写信给我说:如守常动摇,就不客气的开除他。”

实际上,李汉俊和陈独秀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见解原本可各抒己见,加深沟通与谅解,可惜,由于两人分处上海、广州两地,仅以书信表达,一时半会也很难讲清楚。加之在党的经费问题上,两人又发生了冲突,也使隔膜越来越深,关系也越来越僵。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每月仅需大洋200元,但是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据李汉俊嫂子薛文淑回忆: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经常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时为了党的活动经费,甚至把爱妻(已故)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后由她帮忙赎回。

而当时《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据李达回忆李汉俊曾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元

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陈独秀对李汉俊来信提到每月从新青年书社拨200元活动经费很有意见,他对谭植棠说:“这怎么行啊!《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月拿出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事实上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这些本来也不是很突出的矛盾,不过由于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上已心生芥蒂,因此当李汉俊看见陈独秀信上的口气很硬,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李达,对李达说:“这个代理书记我干不了,请你做吧。你要是不愿意做,就请陈独秀找人代理。”这时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已经有点水火不容的地步。

三、分离:一生的遗憾

此时尽管李汉俊与陈独秀的矛盾已经很深,但是他仍然在积极筹备党的“一大”。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后,先后与李达、李汉俊接触,商议尽快召开“一大”事宜。李汉俊即将马林来上海商谈的情况致函陈独秀,要陈独秀到上海出席建党大会,但陈独秀因事未能出席。这就错失了一次两人当面解释的良机。而且由于陈独秀未到会,整个大会的气氛和人事安排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执行委员,而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会议重要组织者的李汉俊却连候补委员都未选上。对这样的人事安排,李汉俊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和情绪。

刘仁静就曾经为李汉俊抱不平,他说:“‘一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有过一些小组织活动,结果他认为应选上的人都选上了,像李汉俊这样的人却没有选上。”在“一大”选举中央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也是唯一的一票。同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主持中央局工作后,李

汉俊与陈独秀进行过一次长谈。李汉俊再一次强调,当今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整个工人阶层还不是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党如果把工作的重点全部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势必产生急躁冒进。然而,李汉俊的思想并没有得到陈独秀的赞同。对于工人运动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全党的思想是一致的。此后,李汉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撰写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宣传文章,这对当时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22年初,在组织中失去了重要地位的李汉俊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专事教学和工人运动。1923年2月,为躲避军阀吴佩孚的魔爪,李汉俊前往北京,暂避在哥哥李书城家里。后通过李书城的关系,李汉俊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任职,为此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给他以处分。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给中共中央写信,宣布脱离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过去党史理论界长期认为李汉俊退出中国共产党是由于陈独秀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另据说1926年10月或11月,北伐军刚打下武汉不久,湖北省委曾开会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但由于陈独秀的拒绝,使李汉俊最后失去了回到党内的机会。”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共“二大”召开的前夕,李汉俊在武汉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托人带给了陈独秀,表达自己对党的工作看法。他指出:“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对于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党还处于幼稚阶段,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别党合作”;鉴于中国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党的组织“无集权制的必要”,“目前亦无集中组织的必要”,而应“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为原则”。看了意见书后,陈独秀致电李汉俊要求他赶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可惜李汉俊或许考虑到一年来与党内同志争论数次,结果很少,或许为了避免争论,或许为了其他什么原因,他最终没有前往上海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但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再次错失与陈独秀两人当面交谈冰释前嫌的好机会。1922年7月,中共

“二大”召开,虽然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但是,李汉俊依然被选举为候补委员。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并不抱有任何的成见。

那么李汉俊脱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他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根据李汉俊的记叙,1923年5月5日,他提出退出共产党的原因是“自共产党成立后,汉俊即因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暨主张援助国民党而遭排斥”。在担任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时,发现主持工会的领导(笔者注:指张国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便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公开的讥评与反对,陈独秀亦由粤来函攻击”。在中共“一大”上,他又因主张援助国民党及组织职业工会,而遭到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以否定”。年底,他灰心“卸脱一切责任地位,返鄂专心教授及劳动运动,然见彼辈种种谬误主张及行动,亦不能不有所抨击,于是恶感益深,压迫愈甚”,产生了离意。

事实上李汉俊的脱党客观上确实是由于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存在分歧和矛盾,他的许多想法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但是我以为更应该从主观方面找原因。

首先是李汉俊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这从1922年2月初他当时写的《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可以看出,李汉俊在文章中与张闻天探讨解决中国乱源的方法时,对张闻天提出的对于组织党的四个必要条件,及对于党的活动所提意见,他极表赞同,不过他说他对于中国人组织团体,还有点意见。李汉俊在文中说道:“我觉得中国人有五大毛病不容易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中国人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非首先把这五大毛病去除不行。”那么是哪五大毛病呢?李汉俊说:“所谓五大毛病:第一就是猜疑心太深;第二就是责任心太薄;第三就是界限不清;第四就是公私混淆;第五就是责任不明。”李汉俊在文章中说党由于存在着这五大毛病,所以党是没有前途了,最终是要消灭的。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同时李汉俊认为在组织之外一样能做事情,只要信仰没有变,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其次性格因素也是李汉俊离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李汉俊的性格很刚直,固执己见、认理不

认人,同时又恃才傲物,脾气也不太好、好意气用事,而且当与人发生矛盾或者不愿与之交友时,则不屑与之沟通。因此,当李汉俊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意见不一、感情交恶时,李汉俊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离开。正如他自己所述那样,“向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洁癖”。以后当中央一再邀请他参加中共“二大”、“三大”时,李汉俊都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弃党的纪律于不顾。茅盾回忆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争论的结果,就是负气脱党回武汉去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遭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并枪杀。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屋 2009年第10期目录

书屋讲坛	“超日”、“超美”与大国之惑	刘 畅
流年踪影	六十六年前一桩没有完结的历史公案 ——《彭德怀全传》读后	郑 焰
	“而今一扫新纪元” ——从《颜福说齐王》和毛泽东的一首词说起	郭铁成
	喜欢拿人名说事的毛泽东	徐应才
	一生滇冲半由己 ——读《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鄢烈山
	我的一段往事	林少鹏
湖湘人物	白云山头松风石	苏 晨
	真实的、美丽的——我心目中的曾志大姐	宋 群
其人其事	“好人”还是“好官” ——谭延闿诗歌世界中的温情与世情	秦燕春
	吴宓婚恋观与家世及早年经历	杨丹荷
	橡园深深	姜异新
裁书刀下	《论语》“民无信不立”补释	景凯旋
	读程巢父说“陈寅恪热”所想到的	李振声
说长论短	“娜拉”回家后怎样? 为了你的孩子	刘剑梅
	关于学术腐败的深层思考	周莉华
思史佚篇	白先勇的昆曲——从牡丹亭及玉簪记说	蒋书丽
域外传真	永恒的诗篇 ——伏尔泰的传奇人生和恋情	吴 迪
	给历史涂上诙谐幽默的黑色	傅 铿
书屋品茗	发人深思的互补 ——读潘能贝格的《神学与哲学》	万 之
		邓晓芒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武汉、贵阳解放的“南京模式”

● 郑亚宇

在许荏华《南京是如何解放的》(以下简称“许文”)一文认为,就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而言,它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城市解放的“天津模式”和“北平模式”有别,前者是打下来的,后者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而南京则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2009年第五期《炎黄春秋》,第28页)

笔者完全同意上述观点。现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有关资料,认为大城市武汉和省会城市贵阳的解放,亦属上文所说的“南京模式”。今试作论证,以求教于读者,并用以庆祝建国60周年。

“南京模式”的形成及特点

南京解放的过程如下:

据许文,“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第28页)

综合许文,南京解放的特点如下:

(1)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1949年间,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并继续进军的威慑之下,敌人已无力与解放大军正面对抗,大城市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及其部门,处于一片慌乱、准备弃城而逃的状态。大军压境,是南京和平解放的必要前提。

(2)我军虽然大军压境,但尚未进入这座城市。而敌人却弃城而逃,城市成为权力真空的“真空时期”。真空时期的形成,是南京模式的特殊内容。

(3)为了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设

备,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或地下党和党领导的其它革命组织),敦请早有联系的社会知名人士出面,组织民众公开维持真空时期的城市治安。由此里应外合,直到解放军入城,城市正式解放为止。有组织地公开维持真空时期治安,是城市得以完好保存、和平解放的必备条件。

(4)真空时期不长,大约三、五天左右。之前,即敌人即将逃跑时,出现“黎明前的黑暗”,敌人多有垂死挣扎,或屠杀、或破坏,我方则通过各种方式与敌周旋,尽量减轻损失。这是敌我双方进行较量的最尖锐阶段。此后,敌人逃跑,真空时期到来,广大人民群众与民众治安会之类组织结合,终于在解放军未打一枪一炮中,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城市。在大军压境之下,城内的敌我双方尖锐较量,而我方终获胜利,是南京模式最后结果。

以上四个特点,就是笔者归结的南京解放模式。

下文将依照上述四大特点,分别说明武汉、贵阳两市的解放,亦属“里应外合、和平解放”这一南京模式。

武汉的解放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失落,宣告了它延续二十二年统治的覆灭。我解放大军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狂风暴雨北往南扫,渡过长江,向华中重镇武汉进军。

地处武汉以北的中原中央局所属的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城工部二部(二地委的简称),其时驻于武汉西北前沿约一天路程的天(门)汉(川)县的沔汉湖游击区。该区域曾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老根据地。刘邓大军南下,开辟了江汉解

放区,境内基本安定,故城工二部的机关驻此,部长邱肱良和所属的天汉县委城工部长陆天虹、云孝县委城工部长饶民太、京应天汉县委城工部长王有学、天京潜县委城工部长林涯萍等,具体领导着争取武汉和平解放的斗争。

(1)真空时期的形成

从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武汉驻军最高首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弃城而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成为权力真空的时期。

在武汉真空时期之前,四野的萧劲光将军率领第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武汉以北的孝感,并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40军153师,也准备强渡长江,包抄武昌,而身为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张轸,率领三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至此,白崇禧乃于15日下午坐飞机弃城而逃。晚7时,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放弃武汉。午夜,国民党58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尚未进城,城市进入真空期。

(2)我方的城工工作

在真空时期到来之前,我方城工二部对武汉的城工工作就有所安排:

“第一,紧紧抓住我军兵临城下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头面人物,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效地策动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走上投向人民的革命道路。”(《武汉城工史料》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的回忆,第34页)如,成功地做好“对汉口市市长晏勋甫的争取工作”。(第34-36页)

“第二,在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统战活动……以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稳定人心,护厂保产,迎接解放。”(同上,第43页)

“第三,在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方面,我们主要是配合武汉市委在一些有条件、有基础的学校、工厂、企业开展群众性的护厂、护校活动。”(同上,第47页)

为了在真空时期保护好城市,由有声望的人士出面,组织一个维持治安的机构很有必要。如身居武汉的国民党元老李书城,于1949年1月23日赴解放区,受到刘伯承、陈毅接待,衔命而归后,以他是地方耆宿、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时是白

崇禧老师的双重身份,与另一耆宿张难先,联名给白写信,表示要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保护城市,并敦促白崇禧不要炸毁公共设施。白崇禧无奈,只好口头答应。他们又给城防司令鲁道元几万元作“搬迁费”,“因此,鲁撤出武汉时,仅象征性地炸毁了几艘江中的趸船。”(详见《武汉晚报》)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逃跑前在我方力不能及的工厂和某些特殊单位,也有破坏。“最令人痛心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齐鲁晚报》)

1949年5月16、17日,武汉终于在里应外合中,获得和平解放。

对于武汉的解放,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张箴副部长回忆说,它是我城工部和包括中共武汉市委在内的其它兄弟组织共同努力,“并与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紧密相配合”“我们才有可能夺取和平解放武汉的全面胜利”。(《武汉城工史料》第8页)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此后又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武汉晚报》)

贵阳的解放

1949年2月,我和萧良汉在湖北的天(门)汉(川)县的中共中原局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鄂中地委(即“二地委”)城工部(简称“城工二部”),作为两名中共党员,由区党委城工部派遣、城工二部直接领导,前往贵阳,作地下城工工作,以争取该地的和平解放。领导又指示我们,可以建立和发展组织和独立处理问题,但不得与当地的共产党和党的地下组织,产生横的联系。

我们于这年的2、3月分别启程,来到贵州省会贵阳。分别住在贵阳的各自家中,并各自开展工作。

我们原是在大学从事反美蒋的学生运动的学生。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因从事活动于1948年“8·19”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而输送到江汉解放区,留在城工二部的,萧良汉则是武汉大学学生,因被敌人注意,由地下交通送到城工二部来。其时,已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形势迅速发展之际。据邱肱良部长回忆:“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

速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根据城工工作既有一定的地区范围,又不受一个地区限制和放开手脚、普遍撒网的原则,派出有条件的人员,到外地、外省开辟工作,以配合全国的解放事业。”我们二人,以家在贵州,符合上述派遣原则,因而派我们去贵州。(《武汉城工史料》第56—57页)

当我们来到贵州,在省会贵阳各自开展一段工作后,这年的春末,我们便以贵阳师范学院为基地,进一步发展组织,稳妥而积极地铺开工作。

选择师院为基地是有原因的。萧良汉的父亲,是我省著名的数学家,不久前由武汉大学调任师院院长,他全力支持其子的革命活动。此前,我以南京局势紧张,辍学回乡,往贵州大学借读,作为公开身份,良汉则在其父安排下,在师院邻近的中山中学作代课教师,住于其父居所的师院理化楼一角,而理化楼其它宽敞房间、地面,则供良汉使用,以便我们活动。师院是一所高等院校,成年学生众多、教职工不少,我们可在其间活动并发展组织,而不易受人注意。所以,以此为基地甚是合适。

随后,为了工作需要,我们进而建立“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这一城工组织,将各自发展的城工人员和小组,置于支部领导之下,支部领导人以萧良汉为正、我为副,而对外,则以我同江汉城工二部联系的化名“郑流”,代表支部,开展活动。其实,城工部是党的一个部门,军区并无城工部。由于当时军事斗争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以军区名义出现有利于工作开展,故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命名。

当时的情况及我们开展的活动,大致如下:

(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

据2006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州党史》):1949年10月20日—22日,由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率领的五兵团,在湖南的“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决定以十七军、附兵团野战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以十六军为左翼,向天柱、三穗、镇远挺进,协同十七军作战。以十八军为兵团二梯队。右翼有友邻十军,负责向铜仁、松桃进攻,争取在黄平以东歼敌四十九军,以利夺取贵阳。”(第400—401页)由上可见,此时的贵阳,已是大军压境,但正在途中,尚未兵临城下。

(2)大军压境下的贵阳城内敌方动态

在大军压境下,贵阳城内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自知难以抵挡。11月9日,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谷正伦召开师以上军政人员参加的应变会议,部署事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谷正伦遂率部仓皇逃离。此时,我军尚在途中,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3)我方的城工工作

〈甲〉搜集情报,探听敌方动态,进行策反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学校内部,但各城工人员还根据自己条件,利用社会关系,开展策反和搜集情报。

如,国民党四十二补给区司令杨亚仙,早年与我方城工人员戴自俺(时任贵阳师院附小校长)在贵阳师范学校同学,曾有交往。我们便布置戴利用这一关系,和杨打交道,受聘为该补给区顾问。戴遂经常出入官邸和各种社交场合,以了解敌方动向(如国民党首脑准备弃城而逃的情报),对我们及时掌握敌情、部署工作,帮助很大。

又如,城工人员王学易(贵州大学学生)利用赤水小同乡关系,先后对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职员曾剑秋、袁永江,调查统计室掌管人事的中统特务税天荣进行工作,均有收效。贵阳真空时期,税由王带领向我们投诚,交出手枪一支和贵州全省中统人员花名册。贵阳解放后,我们把税及其手枪、花名册交给贵阳市军管会公安接管部(省公安厅前身)。曾、袁二人,亦在王动员下,到我公安接管部投诚。……

再如,城工人员刘正荣,以城郊的清镇火车站丁身份观察敌军动向,搜集情报。我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六团作为先头部队抵达清镇时,刘正荣除将搜集到的情报向我部队报告外,还为部队解决了兵粮问题。直到1983年,当时的团副政委徐挹江同志已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还能对我说起城工人员解决军粮的事。

此外,我们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搜集情报。均载《武汉城工史料》第363—364页,不再细叙。

〈乙〉开展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的开展,首先是萧良汉争取其父萧文灿教授的工作。当良汉回到贵阳,与其父多次交谈而父子取得共识后,他便以国立贵阳师院院长的身份,全力支持我们工作。对此,前文已有说明。今再略加补充:1949年6月,贵大知名学者丁道

衡教授等三位进步人士被捕,萧院长闻讯后,亲自起草并领衔致函贵州省政府,进行营救,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终将他们释放。贵阳解放后,萧院长受到苏振华政委热情接待,以后又当选为贵阳市政协一、二、三届常委。

其次,在团结知识界、工商界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城工人员牟中一(贵大学生),在亲友和同乡中宣传党的政策,使贵州企业公司理事李玉墀、鲁丰布厂经理王伯瀚打消疑虑,不仅留了下来,而且还打着红旗去迎接解放军入城。城工人员袁重一(贵阳师院学生)利用在广东街纱商傅家作家庭教师的机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从而安定了许多纱商的情绪,没有卷资外迁,解放后继续开业,对稳定市场、维护生产,起了良好作用。(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62—363页)

〈丙〉开展宣传工作

运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团结群众,是我们开展城市地下工作经常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首先,我们利用一些有利条件,秘密收听解放区的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以了解时局,并作好记录油印,进行学习和宣传。

其次,我们油印或口授一些民歌、民谣,乃致政治性不太明显而又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歌谣,交城工人员在大中学生中广泛开展文娱宣传活动。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老师老师,力竭声嘶!”那些政治性强的歌曲,但已流行者,如《夫妻对口唱》、《茶馆小调》等,我们也适当选用。如此等等。(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59—362页)

〈丁〉反搬迁、反破坏 护校、护厂

由于我们以贵阳师院为基地,所以我们的反搬迁、反破坏,主要在师院(包括附中、附小)。此一活动,是萧文灿院长以其公开身份主持进行的:

首先从组织入手,使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活跃起来,以便开展群众性的护校活动。通过学生自治会筹办了工人夜校(工作人员中有城工人员),使工人与学生团结起来,成立全校性的师生员工互助会,付与监督学校行政之权,使其起到统一领导护校的纽带作用。同时,由院长召开大会,公开动员,号召大家热爱学校、保护院舍校产。

第二,反对搬迁,积极筹集费用,维持师生员

工生活,稳定教学秩序。在萧院长号召护校期间,学院的几个三青团头头拉着学生会主席刘文斌(城工人员)去见院长,问他“为什么不见迁校动静?”萧院长从容拿出学院向省绥靖公署请示迁校的报告底稿,给他们看,说是一经批复、拨下经费、划定地点后,立即搬迁。询问者语塞而出。事后,萧院长对刘说,省绥署等机关忙于逃跑,哪有钱给我们迁校?其时,萧院长在广州开会,好不容易领到一笔“临时措施费”,他即将此款交善于经营的同事,妥加安排,换为黄金、银元,存入可靠的商号,取息维持全院费用,从而稳定师生情绪,不搬迁、不停课,保护好学校。

因此,贵阳师院以学校保护完好、师生不散、未停一天课、员工工资照发等为特点,而成为贵阳高等院校中最出色地完成了反搬迁、反破坏任务的学校。

除贵阳师院外,城工人员杨守达,在中山中学团结一批老师,组织同学,手持“董军棍”日夜守卫,保护学校。在贵大、贵医,支部在该校的城工人员,也和学校师生一道,参与了护校斗争。

护厂方面,贵阳电厂职工中的城工人员王绍聿、叶淑美夫妇,参与了电厂的护厂斗争。那时,电厂也有其他地下党员在护厂,我们的工作起了配合作用。王绍聿同志其时是我城工人员戴自俺组织的“行知读书会”成员。后来知道,他原是1938年在河北保定入党的党员,因失去党的关系,辗转来到贵阳电厂。解放后,夫妇俩回到保定。1987年7月17日,保定市委以“市组审字(87)89号”文,落实政策,恢复了他“1938年6月入党”的党籍。

贵阳电厂中,破坏与反破坏斗争是极其艰苦的,其成就也是辉煌的,它是解放前夕全国六家没有受到破坏、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受到中央和省、市的表扬,获得燃料工业部1950年颁发的“护厂先锋”奖旗。

〈戊〉争取有声望人士筹建维持“真空时期”治安的民众组织

早在真空时期形成之前,萧文灿院长就关注贵阳这座城市如何免遭敌人破坏、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的问题。他向我和良汉提出组织群众性治安会的设想。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另一城工人员、师院附小校长戴自俺参与下,我们同萧院长一道,列出一份约有三十人的、可争取的贵阳上层人

士名单,又拟写了一封信,陈述当前形势,敦请他们出来组织一个维持贵阳治安的机构,在国民党当局无力或不能维持贵阳治安时,由这个机构保护城市和人民。

1949年11月上旬,我们将这封信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名义,按名单分别投递。对于有些头面人物,则通过社会关系,直接送交:

——如卢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委任他为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因而虽早已解甲隐居,但声望极高。因此,我们通过与其家有旧谊的城工人员翁晋卿送去。为了慎重,萧文灿院长以夫人王杰与卢焘女儿同学的关系,而亲赴卢府,请他早下决心,出面主持治安会。此事直至1983年我再访卢焘女儿时,在座的卢焘表侄,还记得当年见到萧院长的礼帽和手杖的情景。

——如张彭年时任贵州省参议员,为地方耆宿,其敦促信是我单独送去的。由于张老先生与我的叔祖父郑先辛(地方军阀王家烈任贵州省主席时的财政厅长),有师生之谊,其幼子张汝□与我相熟,就由我在晚上悄悄到他家,交他转呈。

——如郭润生原是贵阳颇具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帮会头面人物。我们派城工人员罗家骏去完成送信任务。因为罗的友人李树华,系曾任贵州省主席的李小炎之女,与郭府常有往来,所以罗家骏在她陪同下,将信送到郭手。

……

1949年11月11日,卢焘、张彭年召开“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千余人。大会选出卢焘为主任委员、张彭年为副主任委员、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由15人组成,下设秘书、治安、联络、总务四个组,正式启动临治会的护城治安工作。(按:临治会成立日期,本文采200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阳党史》)的说法,见第352页。未采用200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中临治会成立于11月10日的说法,见第390页。何者为妥,待考。)

临治会成立后,随即贴出成立布告,开展各项工作,对“维护全市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引自《布告》)、安定人心,起了良好作用。

临治会的成立,是我党在中共贵州地下省委及贵阳的各地下革命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

所述仅是笔者所在的地下城工组织所作的一点微薄工作而已。切望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及知情者予以补正,而臻完善。

临治会的成立,在谷正伦等11月10日率部逃离贵阳后,而我解放大军尚在途中,城市形成权力真空,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此前,在谷正伦行将逃跑之际,他批阅了大屠杀名单,交副司令韩文焕执行。韩随即又将此名单批交手下,自己即同谷正伦一行窜逃。11月11日,谷、韩手下遵命制造了惨酷的“双十一血案”:将狱中的24位革命志士押出,分别杀害于贵阳的沙河桥和马家坡。

随后,刘伯龙率国民党89军,由安顺窜入贵阳,进行骚扰,并于14日晨弃城而逃时,杀害了贵阳市临治会主任、国民党耆宿卢焘将军。

〈己〉贵阳和平解放

1949年11月14日晚九时许,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城边的油榨街。我们在获得此一喜讯时,便派出城工人员,戴着写有“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红布袖套、拿着小红旗,前往欢迎解放军,并进行采访。此时,进入油榨街的部队,除继续向清镇方向追剿残敌外,随即连夜入城。临街住户,拉出电线、亮起电灯,拍手欢迎。入城部队,沿街放哨以稳定城市秩序。此时的贵阳,实已解放。15日,我军正式举行入城式,标志贵阳解放。新华通讯社16日电讯,发布了此一新闻报道。当时由于我省尚未建立政府,没有自己的机关报,所以两天之后,才由业已解放的上海,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报道贵阳解放的新闻。

但是,1949年11月15日,贵阳街头就出现了一张铅印的《解放快报》第一号,率先报道了贵阳解放。报纸注明为“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编”、头条新闻以黑体字标题:《人民解放军昨晚开抵贵阳》,注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出版”、“本报奉送不取分文”,以五万份的数量,由城工人员散发,市民争相传看。后来贵阳的媒体介绍说,这算是“我党最早报道贵阳解放的报纸”。

《解放快报》在一、二号上,对贵阳真空时期到解放军入城的14、15两天的情况,均有报道。

(本文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伟)

五星红旗的故事

● 俞乃蕴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以后,在全国各个地方,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五星红旗在万里蓝天之下,迎风飘扬,令人激荡,令人遐思。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让我们打开历史尘封的史册,回溯一下远逝的一瞬吧!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曾于1912年1月12日,致函参议院,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虽然不满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到了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议把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第六小组具体负责。参加第六小组的有: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等16人。在1949年7月4日和8月5日的第六小组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聘请专家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参加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并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一个月内,全国就收到应征有关国旗图案的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其中安徽来稿47件。

马叙伦、沈雁冰在《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中称:“国旗、国徽的图案应注意体现中国特征和政权特征,国旗图案应以庄严简洁

为主。从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上,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镰锤交加并加五角星者,来稿也多,无论形式如何变换,总有摹仿苏联国旗的感觉;二是,嘉禾齿轮加五角星,形式上很难配合,与“简洁”之旨不符;三是,一半摹仿美国旗,一半摹仿苏联国旗,构思设计,都不足取;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亦不少,其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陈嘉庚先生对大会拟制国旗,显得很激动。他说,早在1940年到重庆,就请了专家设计一个国旗方案,印了一百多张报给国民政府,后见到国民党官员的专制态度,遂作罢论。他还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之义,这是我最不满意的。陈嘉庚说,1942年他在印尼写的《南侨回忆录》,就讲到了《国旗之意义》,评述了自己的观点。

1949年8月16日,北京饭店413会议室,设立了国旗临时选阅室,有些经过挑选的国旗图案,在那里陈列展出,供政协代表参阅。当时,评选委员们看好的是三幅图案,一律都是红底黄色。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者认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据《张治中回忆录》称: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大满意。他向毛主席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

像孙猴子金箍棒。”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了四五十人,尽是文化人,有画家、艺术家,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丘八只有我一个。”毛主席在说明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毛泽东说到这里,他把第36号参考资料给大家看。这是上海市曾联松设计的图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问:“这个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好,只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家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现在的五星红旗的图案,是在曾任上海市政

协委员曾联松先生设计图案的基础上修改、审定的。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把他设计的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删去了,显得简洁了。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在《决议》后还附录了《国旗制作说明》。

曾联松先生生前记忆犹新。1950年9月,他曾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曾先生当年上天安门观礼台的编号是:“台右67号”。1950年11月,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1137号公函称:“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当时旧制),分别交邮局和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作者曾任安徽省政协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探索文库”系列丛书(总第5辑)征稿启事(文史类)

“社科文献论丛”系列丛书(总第17辑)征稿启事(社科人文类)

为了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促进学术专著的社会化利用,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探索文库”系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4辑(每辑10册)计40部图书;“社科文献论丛”系列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16辑,共计160余部图书,其中,多部图书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地方大奖,引起行业广泛关注。这两套选题(丛书)新的一期图书正在组稿中,相关事宜如下:

一、书稿要求 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够较好反映目前社科领域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焦点、前沿问题、具有新颖性和时效性。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

二、征稿范围 书稿主要以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历史与年鉴、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论著。以学术研究著作、学术研究论文集等为主,亦可为人物传记、社会纪实作品。

三、出版发行办法 本年度计划出版100部,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分别面向国内以及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国家级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四、其它事宜 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2、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到二周内回复;3、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注明联系地址、电话;4、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另需要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人物传记,书画作品,以及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教育教学等题材书稿,欢迎您赐稿!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100025)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丛书编辑部(收)

热线咨询:(86)10-81118378、81118398、86878777、58429718 传真:(86)10-89506467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羽菲、文馨、汪鹭(编辑)

详情请浏览网站:<http://www.zuojia.com>(中华出版热线)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

· 吉元



如今,对45岁以上的人来说,有一种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狂于60年代中下期“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语录》热。因为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人们对它看得很重,视为宝贝,所以,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档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里,男女老幼人均达到了1册半。

《毛主席语录》几乎无人不有,无处不在,无事不用,成了“文革”初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40多年前。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大地,从城市到乡村,从街道到工厂,从机关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摇动,“最高指示”在众人口里念诵,《语录》舞在男女老幼中跳起,《语录》歌在千百万人里歌唱。无论大江南北,秦岭东西,建筑物上、田野里、用具上,到处都敬书了毛主席语录。全国几乎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

在机关,在学校,在军营,甚至在一些家庭中,早晨起床,晚上就寝,都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人们并排站在室内悬挂着的毛主席像前,将《毛主席语录》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然后学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早上便请示一天的工作,到了晚上就汇报一天的工作。稍有疏忽,就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最大的不忠。弄不好,还会招来麻烦,甚至有杀身之祸。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几乎人人手里有一本《毛主席语录》,胸前佩带一枚毛主席像章。公共场合,只要谁忘记带了,就会把你找来刨根究底,审问个半天。弄得人人自危。

人们在工作 and 生活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互相呼应。上街买东西,要对售货员说一句“‘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一斤白菜”。然后,售货员回答“‘为人民服务’,这是你买的菜”。

打电话也是如此。那时不是现在这样的自拨电话,必须通过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接转。接通电话后,第一句必须说上一句《毛主席语录》里的话。否则,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可以拒绝转接。

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人们读的是《语录》词,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和工作密不可分。人人都有语录本,到处都是语录牌,成了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广阔大地的一大“文化景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一些被批斗和打倒的老干部、“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也在想办法借用毛主席语录来保护自己,为自己辩护。当时,用得最多的毛主席的话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听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被造反派批斗时,他要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本,翻到第273页。然后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周总理可以作证(这是陈毅自己将毛主席在某个场合说过肯定自己的话写在语录本最后的扉页上)。弄得造反派啼笑皆非。尽管陈毅不乏幽默,可仍然还是被造反派批判。

至于“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借助毛主席语录,那是得不偿失。照造反派的话说,是自不量力,毛主席的话怎么能对他们派上用场呢?因此,不仅没能得到丝毫帮助,反而还会招来灾难。

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林彪

上世纪60年代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

1960年9月,已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全军发出号召,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新高潮。他还说,在处理训练、生产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关系上,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形成的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



中心内容的决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掀起的。《毛主席语录》又是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

到了1961年4月,林彪更明确地指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发了话,说得这么明明白白,《解放军报》自然是不敢怠慢。于是,立即着手做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准备工作。恰在这时,军报编辑部得到消息,说《天津日报》社有一套毛主席语录专题卡片,查找引用极为方便。他们赶紧派人赶往天津,在征得《天津日报》社同意后,很快索回了这套专题卡片。在每日的军报头版显著位置上予以刊登。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专题卡片的基础上选编的。

林彪对《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非常满意,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1962年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做法。博得了毛泽东的首肯。

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对军报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也很赞许。

部队对《解放军报》的举措更是拍手欢迎,连连叫好。许多干部战士自觉地把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汇集成册;有的战士甚至买来小本子天天抄录,自制成语录本随身携带;基层连队用木质材料制成语录牌,无论是训练还是劳动,走到哪带到哪。营房里,训练场上,工地上,到处都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干部战士的这种热情启发和激励了《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同志,他们为基层干部战士的热情所打动,准备为部队编辑一本便于携带的袖珍式的《毛主席语录》。并立刻向总政治部领导汇报。

出版《毛主席语录》,《解放军报》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作为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具体行动

1963年12月20日,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



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手持“红宝书”

议的军报负责同志把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当面向总政领导汇报。总政治部领导讨论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毫不迟疑,立马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尽快编辑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毛主席语录》出来。

军报得到了总政领导的批准,此前又有林彪的旨意。因此具体实施起来一路的绿灯。他们集中编辑人员拟计划,选内容,定方案。大家以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四无限的无产阶级感情,把编语录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加班加点地进行。到1964年1月5日,就选定了23个专题,摘编了200条毛主席的话,拟定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并装订成册。编辑部的同志立即马不停蹄地送到尚未休会的代表手里征求意见。后来根据与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对语录进行重新调整,题目也直接叫《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录语录267条。就这样,从确定编辑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真是雷厉风行。

后来又几经修改增补,力求从形式到内容,出版一本精品《毛主席语录》。

因为当时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此事又是他首先倡议的,所以有关方面建议,请他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提出最好用雷锋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四句话,林彪高兴地答应了。同时还由总政治部署名写了“前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总政治部署名的“前言”改由林彪署名“再版

前言”。1966年12月17日,中央各大报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都在最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这样,33个专题、427条语录、包括前言在内近1万字的《毛主席语录》定稿出版。此时,总政治部决定,将《毛主席语录》先在军队内部发行,干部人手一册,战士每班一本。为了便于携带,到

1965年8月1日,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选用红塑料作为《语录》的封皮。这就是后来流行于世、常见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但是战士每班一本很不够,大家都抢着看。而当时,毛主席著作又几乎是唯一的学习资料。这时,林彪又发话了,“要多印一些,一定发给每人一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从此,中国军队的每一个战士,像拥有一杆钢枪一样,也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出版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带头索要

《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时正是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既然解放军战士人手一册,走到哪带到哪,地方何不仿效呢?于是,一方面,经中央同意,中宣部、文化部在组织班子赶编毛主席语录。后因种种原因未果。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纷纷打电话,发电报,寄信函,联系从部队渠道购买,有的还请求代印。大家都以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引为光荣和自豪。听说,有的小学生因为没有得到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还哭过鼻子哩!

甚至连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索要。最早是朱德同志,这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识、共事40来年的老资格的军事家,在《毛主席语录》出版第

五天,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也派人来拿。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三次索要,唯恐收不到,还要求直接送到他的手上。彭真、刘伯承、贺龙、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自己或委托秘书先后要过。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周边的一些省、市也派人登门索取。使得解放军报社应接不暇。

全国人民要求拥有《毛主席语录》的呼声日高。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给地方代印。从1964年5月1日到1965年8月1日,共代印了1200余万册。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中宣部、国家体委等机关也都代印了不小的数目。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写具书面报告,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出版发行总政治部编辑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毛主席语录》。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赶印《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形成了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冲出国门,风行世界

《毛主席语录》在祖国大陆发行,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没想到,后来还在港澳和台湾地区出现。甚至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首先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他们渴望看到并得到这本灼手可热的书。不少港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又直接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

后来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马列主义的政党、友好国家向我驻外机构提出了索要《毛主席语录》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越南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共80多万册。

有些国家因等不及我国翻译的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法国、

意大利、日本、德国、比利时、印度、巴基斯坦、西班牙、老挝等国家,用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个版本的《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几乎同样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然而,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任何一件事有开始必有结束。随着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毛主席语录》热戛然而止。红宝书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纷纷落下,最后在人民生活中逐渐地消失。

毛泽东是否赞成《毛主席语录》——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语录》之风如此盛行。此举,毛泽东本人赞不赞成呢?这是人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毛泽东是同意的。有档案资料为证。

其一,1965年12月28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中说道:“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辑6万字左右,现只编辑出一部分,约3万字,给我送来了一份。”这里,很明确地谈到毛泽东本人曾有过编辑语录的打算,而且交代了具体人负责办理此事。

其二,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刚面世,毛泽东就派人去索要。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的态度。

其三,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向军报打来电话,告知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提供《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

其四,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历史和个人的需要,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做法,一次又一次地赞许用多种形式包括用《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个人及他的思想。而且最终将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的林彪推上了副统帅的位置。当然,这不是毛泽东一人所为。

以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本人当时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作者为湖南省档案馆原副馆长)

(责任编辑 杨继伟)

揭秘台湾地下党

● 蒋益文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台湾地下党的起源

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

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即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练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

台湾地下党的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尽人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向张

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当时吴克泰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吴石是一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他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女儿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谡之与吴石联系。朱谡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谡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

“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被杀害的台湾地下党

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



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地。

1950年2月2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台湾地下党的结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

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作者为云南经济日报社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资治文摘》

邮发代号: 80-366

单册8元 全年96元

电话: 010-58689890 传真: 010-58689894

领导人的随身锦囊 管理者的案头经典

《资治文摘》由新闻出版总署直接主管

16开全彩月刊,秉持《资治通鉴》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理想,全面覆盖人事变动、政策解读、时政热点、文史精华、健康养生等信息,独家提供“一把手动态”、“官员笔记”、“中国高官名录”等特色内容。

资治文摘

阅读创造价值

“克虏伯”大炮的沉思

● 余良明

在福建厦门的胡里山炮台上,至今保存着一尊一百多年前从欧洲引进的巨型大炮,它就是“世界现存十九世纪制造的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后膛海岸炮”——“克虏伯”大炮。据说它已载入“吉尼斯之最”。福建电视台曾经以它为线索制作了一部专题片《春秋克虏伯》,详细介绍了它的来龙去脉。笔者有感于它的沧桑身世,于是重游炮台。“克虏伯”大炮面海偃蹇,引项苍空,倔强而悲愤,固执而孤寂。夕阳残照中,层层涌来的天风海涛迅速地将我们推进到了文化反思的前沿。



“克虏伯”大炮

中国近代文化史经历了“三段论”:从“太平天国”运动末期开始到“甲午战争”结束时期的“洋务运动”是第一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第二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恰好对应着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且是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式来展开。厦门胡里山炮台上的这门“克虏伯”大炮,可以说是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过程与结果的缩影。

“克虏伯”大炮是十九世纪德国克虏伯集团生产的一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也是当时先进的物质文化代表之一。清廷引进它是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达到维护满清政权的目的。于是清政府花巨资购买了三百二十八门克虏伯大炮,万里海防一时间都安上了这种最新式的武器。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高枕无忧,皇图永固了。然而“克虏伯”乃至整个洋务运动所搞的物质文化建设都拯救不了腐朽的满清王朝,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抵挡不住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文化潮流。短短的十年间,装备有精良的“克虏伯”

大炮的南北水师,先后“檣櫓灰飞烟灭”,均遭灭顶之灾。可见单靠先进武器和物质文化层面的建设是实现不了所谓的“强国梦”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先进的武器、物质文化的后面还要有先进的制度文化(民主、法制、规则等)的支持;不仅如此,在它里面还凝结、包含着精神文化(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世界观、时空观、工作理念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本质规定。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界只是在概念上、理论上为了分析的方便才将它分别为三个层次来对待,实际上是渗透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但由于物质文化往往是以表面上、形式上相对独立的“文化物”(这是笔者杜撰的概念,指“坚船利炮”、“声光电”等人工实体)这样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当时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实践领域里将它们割裂开,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妄图在保留帝国“遗体”(即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前提下“用”西方的物质文明,这实在是真正的自欺欺人。以文化外延

的一个分子——体育中的球类比赛为例。球是物质文化，规则就是制度文化，“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精神文化。“中体西用”说者以为只要把球抱到了怀里，就算胜券在握了，不知也不讲比赛规则和体育运动的精神与目的。因此屡屡犯规而不知，最后只有被罚下场。有识之士如严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牛之体，方有负重之功，有马之体，方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体马用、马体牛用之说也。”洋务派被急功近利急昏了头脑，却忘了或故意不提他们的“中学”里有一句连平常读书人都知道的话：“体用不分、显微无间”！数典忘祖，因而牛头马嘴起来。

从实质意义上说，南北水师的全军覆没不是败在外国人手里，而是毁于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下，是“中体西用”说的牺牲品，思之令人悲悯。专制制度必然出腐败政府。腐败政府之下不会有正气之师（这样的军队甚至更腐败）。腐败之气遍被华林，南北水师的战舰事实上早已被腐蚀得锈迹斑斑，焉能不败！奴化的人民难出真的战士。真的战士出于自由的人民。只有自由的精神文化才能培养出自由的人民。由自由的人民组成的军队和国家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自由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中”之“体”、国之“本”！洋务派舍本逐末、离体求用，不是去“务”自由公民这个真正的“本”和“体”，而只是拉起了一支外表好看的仪仗队。这样的军队只能对内吓吓老百姓，中国人与中国人打内战而已，对外作战一触即溃。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迫承认，他搞的坚船利炮南北水师等等，都是纸糊的东西，一捅就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花了几十年时间和大量的银子，搞起来的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教民”不仅仅要教怎样开船开炮，更要教育培养怎样做一个自由的公民。以缺乏自由精神的“不教民”去作战，既愚蠢，又残酷。

不可否认，洋务派的只关注物质文化的“近视眼”毛病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在异质文化相接触、相碰撞之初，为双方的文化主体所关注的焦点必然集中在属于对方文化的表层结构的物质形态的形而下方面，这不足为奇。但“洋务派”之所以眼光狭小到只盯着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坚船利炮”上，除了上述的种种原因之

外，似乎尚有特殊的民族心理因素在作祟助长，那就是崇尚“法宝”的心理。“法宝崇拜”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沉重的民间基础。且不说“干将”“莫邪”、“吴刀”“周宝”，中国古代章回体旧小说如《杨家将》里大破天门阵的降龙木、《说岳全传》中岳飞使用的由神蛇变成的“沥泉神矛”、武侠小说里的各种神秘的独门暗器、乃至金庸的“倚天屠龙”、古龙的“七种武器”……等等，都是所谓的“物华天宝”，而“法宝”最多的要数《西游记》，里边神仙妖魔使用的各种“宝贝”更是无奇不有，最厉害的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了。这些都是“法宝崇拜”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同时这些文学作品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心理。第一次见识西方坚船利炮之厉害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那是洋人的“法宝”。而“法宝”是可以用“邪物”、“邪气”去“破”的。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林则徐用尿壶装着女人的尿去“破”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尿壶计”（福建民间传说）。“破”不了就要想办法去拥有。谁拥有了这些“法宝”，谁就能克敌制胜、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了。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洋务运动和“克虏伯”的到来……应该承认，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不能没有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的强大威力也不容低估。但“法宝崇拜”过分夸大了武器的作用，把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并加以绝对化，从而再也看不见其他条件配合的必要性，再也不会发现和重视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眼光因此变得极其狭窄短小。整个“洋务运动”以“坚船利炮”为目标，以军工生产为中心，举凡矿山开采、铁路修建、架设电缆、乃至开公司，都是围绕着武器军备而提供的一条龙服务系统。一旦这种迷信心理取得优势，在“军机处”占了上风，无论拥有还是没有“法宝”，失败的祸根就都种下了，因为他把赌注全押在了那“宝”上。一旦“宝物”不灵，这一条龙就像“多米诺效应”一样全垮了。“甲午”战败，“洋务运动”也旋即以失败告终。但“法宝崇拜”心理直到“甲午”战后还在继续。甲午战败后，寻究其原因，一般人还都认为是慈禧太后把原定购买“克虏伯”炮舰的军费挪作修建颐和园，而日本君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则上下齐心协力买下了这艘军舰，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其实当时中国的海军从物质力量来说已超过日本，是亚洲第一，根本不差

那一艘“克虏伯”炮舰。可以看出，“法宝崇拜”又一次显灵。

这样看来，“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和失败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性，因而对于“洋务派”我们也就不应一概苛责。但在一百多年后历史已然昭示明白的今天，在明明知道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是先进文化中更重要、更根本的“好东西”时，如果还有人罔顾人民的进步要求和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坚持新的“中体西用”方针，顽固地拒绝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那么，无论他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辩解说明，都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居心。如果坚持“中体西用”的人关心和追逐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那他们就连“老洋务派”也不如了。

如果说“老洋务派”的“坚船利炮”运动和“中体西用”主张是因为无知和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而作出的文化选择的话，那么，“新中体西用论”者所做出的只引进物质文化而排斥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的文化选择就是一场自觉的把中国引入已经证明失败的歧途。

回到“克虏伯”问题上来。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认识，依旧和一百多年前一样，将它归罪于是慈禧太后挪用了原本定于购买“克虏伯”炮舰的军费去修建颐和园。关于慈禧“军购案”的是非得失，下面再说，这里先说说何以会发生这个“军购案”的问题。为何日本能倾全国之力，天皇捐私资、皇后捐首饰，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去购买那艘后来取名为“吉野号”的“克虏伯”军舰？为何中国那笔原定用于购买那艘军舰的军费却由于那位老人的一句话就挪作修园子之用而全国军民竟连一句异议都没有呢？这不正是制度文化问题吗？日本自

“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中国还是固守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一个人或少数人拍板决定要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哪怕是“大”错特错的“大”项目，国人也无权过问。

至于说到慈禧“军购案”的是非得失问题，在这里我们真碰到了历史辩证法的吊诡“悖论”了。笔者满怀多重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情但又不得不遵循逻辑的理性作如下的冒险推演：假如慈禧当年没有挪用那笔款子而是购买了那艘军舰，就能保证中国必胜而日本必败吗？以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来看能合理地推出上述这个结论吗？如若不能（而这倒是极可能的！），那么与其同样免不了沉舟黄海，倒不如让这笔款子去修颐和园，至少它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美丽的可供后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这有“以成败论英雄”之嫌，但绝无肯定那个老太婆的做法是正确的意思。在面对这个“歪打正着”的事实时，我们的理性和感情均处于失重状态。这个“歪打正着”之举的符号（颐和园）所象征的意味，不知是塞翁失马、祸福相倚之道的隐喻呢，还是和平事业胜于战争的昭示？抑或是上天对我们这个奴化已久的民族的惩戒兼怜悯所动用的一条补偿原则？

“克虏伯”张着沉默的大口，对着碧海苍天，一句“天机”也不泄露……

（作者为福建教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杨继鹰）

何中国那笔原定用于购买那艘军舰的军费却由于那位老人的一句话就挪作修园子之用而全国军民竟连一句异议都没有呢？这不正是制度文化问题吗？日本自

安徽老年报三字经

——代发行广告词

老年报	读者夸	如春风	暖万家
报虽小	容量大	如夏雨	驱炎夏
用至情	讲真话	如秋爽	心神暇
扶老弱	不玩假	如冬阳	照广厦
送医药	请专家	百花园	是黄花
送信息	去枝丫	可传香	可泡茶
送文章	简而佳	清肺腑	助消化
不趋时	不拍马	老朋友	请用它
雅中俗	俗中雅		

欢迎
订阅

邮发代号 25-42

安徽老年报

2010

- ▶一版 新闻言论
- ▶二版 卫生保健
- ▶三版《枫林》副刊
- ▶四版 综合
- ▶月末为生活版

本报 4 开 4 版
每旬二期
逢五逢十出版
全年订价：28.40 元
零售每份 0.40 元

本报是我省唯一的老年人报纸，曾荣获国家一级报纸、省编校质量先进集体、省工商广告发布文明、诚信单位等多项殊荣。

本报发行部地址：合肥市庐江路 6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传真：0551-2653071

卡廷惨案： 历史不能永久地被掩盖

• 陈继礼

我国原驻波兰大使刘彦顺在2004年2月北京《纵横》月刊上著文，详述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枪杀25000余名波兰被俘军官的所谓“卡廷之谜”，使一桩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空白”越过了“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以见证人的资格，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就在著名作家邵燕祥的《卡廷纪念碑》（收入其《文集·史外说史》）中看到，随后《羊城晚报》也以《15000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1998年10月23日十六版）有过进一步披述。不过要说完整详尽，还是刘大使这篇长文。他说：“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前苏联人民内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报告作出的，后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的为11000人”。即是说把上述两文先后所述的由15000人进而升至21857人，把还遗留的人的数字补上了。刘大使在文中还附有贝利亚关于处置波兰战俘报告的影印件，上面看到经过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此件未见贝利亚签字。〔俄〕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群众出版社）一书中说，贝利亚是个不嗜杀的人。）时间是呈报当天1940年3月5日。此外还附有1992年10月14日俄国总统叶利钦特使鲁·皮霍亚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移交卡廷事件密档第一卷的副本和一帧当时持赠的合照。这样，“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正是这样，“这件事确定了真正的祸首是苏联”。

卡廷事件之所以产生，有着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不光彩的政治图谋。1939年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夕，欧亚两洲上空，战云密布，各国在外交舞台上自然尔虞我诈。当时苏联正处于德国和日本西东两面的威胁。为了确保东线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第2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就“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以中国领土为互相馈赠的供品”（《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的中德日三角》）。在西线，苏联早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驻德使馆参赞黑尔格一起与希特勒密谈。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由德国政府代表里宾特罗甫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第2条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卷入类似战争之行动，则其他一方，即不得对上述第三国，予以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舒宗侨编著第16页中国书店出版）这就等于肯定给予希特勒敢于加快侵犯波兰的步伐。果然，不到一个星期，9月1日早上5时20分（波兰时间），德国立即投入兵力90个师团达100万人，飞机6500架，首先在海尔半岛上空对波兰空军根据地的浦克一带轰炸，发动对波兰的全面侵入。11日华沙被炸17次，成了焦土，16日波兰政府被迫迁往卢布林、丧失指挥抵抗能力，华沙被围。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为了“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生命为由”，出兵波兰。波兰总司令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结果被俘虏了

25万人。这样德国自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双方夹击下,27日波兰宣布投降。苏联在东部占领了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9月28日德国里宾特罗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订了《德苏友好与划界协定》。实现了当初两国秘密瓜分波兰的既定目的。这样从9月1日,到10月5日战争开始后的35天,波兰完全灭亡了。苏联莫洛托夫胜利后说“今日,我们(苏联和德国)不再像以往一般的是敌人了”(《画史》105页)。但是希特勒“醉翁之意”不止波兰,而是整个苏联。1941年6月22日黎明,希特勒终于撕毁苏德一切条约,从波罗的海海岸到喀尔巴阡山麓,绵延1500公里,投入总兵力200万人,同时分3路对苏联实施猛攻。希特勒亲至前线指挥。在最初作战的3个月中,苏联公布自己损失飞机5300架、战车7000辆、大口径炮8900尊。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苏联于1941年7月12日与英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期间之共同行动协定》(后来莫洛托夫又亲赴伦敦,于1942年5月26日与英国外相艾登共同签订了《英苏军事同盟主文》——20年的军事同盟,《画史》150页)。7月30日苏联又同波兰流亡政府“伦敦波兰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其时原波兰总统莫锡基与外长贝克逃到罗马尼亚转赴巴黎,于9月30日提出辞职,由赖克维兹继任,任命西科尔斯基将军为内阁总理)签订《苏波互助协定》,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并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重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1941年12月3日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因为在这之前,1940年10月波兰军官林格上校奉命向苏联内务部查询过被俘波兰军官的下落,部长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曾出面回答:“没有这些人。”1941年8月4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纳流散的波兰官兵。但几个月过去了,前来报名的不足1000人。虽经一再查询,苏联总避而不答)没想到这次“斯大林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军的事,说‘他们被释放后就跑掉了,可能跑到了



俄罗斯总统特使鲁·皮霍亚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卡廷事件密档副本(1992年10月14日,华沙)

满洲里(中国境内)。”1942年3月18日安德尔斯又直接向斯大林查询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斯大林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派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鲍格莫洛夫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全部被释放。”后来波兰流亡政府于1942年夏天,根据当地居民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一带的密林深处发现埋着成百上千人的“公墓”及从现场遗留的信件、日记、军服上的星徽、钮扣,足资证明死者均为波兰军官等等证据,备文转致苏联政府。这样,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均没有取得答复。直到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一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新闻: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了8个埋有几千人的葬尸坑,从死者军服看,他们是波兰军官,死亡时间大约在1940年春天,都是被人“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暴行”。4月15日,莫斯科电台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同日,波、德政府分别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赴卡廷森林进行调查。但由于苏联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拒绝了波、德的请求。同年下半年,苏军收复了斯摩棱斯克,组成以布尔琴科院士为首的调查组奉命到卡廷调查。报告说:“尸体头上的德国造子弹和从脑后开枪的‘纳粹方式’,均说明凶手为德国。德国贼喊捉贼,嫁祸于苏联。不过是戈培尔之流恶人先告状的一惯手法。”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但最后也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是否“因为纳粹曾在白俄罗斯一个名

为卡廷的村庄进行过大屠杀,而两地名称发音相同(写法其实有异,前者为Katyn,后者为Knatyn),所以两件事很容易被混为一体了”(〔波兰〕戴立娜《苏共残杀波兰人的历史真相》)。或者是出于希特勒的一贯罪行,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应当相信盟友:“善良的‘乔大叔’怎能枪毙手无寸铁的军官呢?”(《斯大林秘闻》〔俄〕爱德华·拉津斯基著 新华出版社第577页)。终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断定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是谁所为。而且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均被苏联斥之为“戈培尔版本”的反苏宣传。斯大林死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参与歪曲和隐瞒”。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被枪杀者总数是21857人,档案馆保留这些人事档案,建议销毁;1976年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3人也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而当时波兰官方,却“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但是波兰人民心里都很明白,它始终是一根深深扎在心中的针刺。从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到解体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都感到卡廷事件如不抓紧澄清,不单单是个历史问题,而是直接损害领导者形象和威望同削弱政府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盖莱克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统伊始,即于1990年4月11日—14日以

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在卡廷事件(1940—1990)50周年之际亲自访问苏联,并专程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苏联塔斯社在13日公开声明:“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卡廷事件就完整地告诉了世人。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人民解开了这个被谎言掩盖、歪曲、“嫁祸于人”近50年的“卡廷之谜”,他理应受到波兰人民的追怀、纪念;自然,也应受到世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人深切感念,牢记不要让下一代人继续在谎言中挣扎成长。

也许正基于这种理念,俄罗斯一些具有人文精神和深切情怀的作家也不断地对这段历史及其酿造的悲剧进行深刻的反思、独立寻索,不囿于现成的“结论”,去作无为的絮述。而是在广泛的历史素材上进行收集、创作。严正审问假、丑、恶,着力讴歌真、善、美。如几年前我就读到〔俄〕爱德华·拉津斯基著的那本“最好的一本斯大林传记”(《南方周末》1999年1月12日第10版戎化文)《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8月版)。著名作家牧惠推荐的《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羊城晚报》1999年2月5日第十版)第一本就是它。关于卡廷的记述是:“波兰沦陷后,有两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送到离边境不远的斯大林俘虏营里。后来,斯大林准备向德国进攻时,他害怕在国内留下许多潜在的敌人,他还记得1918年捷克战俘的叛乱。像往常一样,他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俘虏们被‘消灭’了。”(第577页)另

一本《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 新华出版社)说“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带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用卡车把尸体运到城外,将尸体埋在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廷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第255页)。

刘大使文说,卡廷事件曾经成为“历史



在贝利亚上呈的关于处置波兰战俘的报告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1940年3月5日)

空白点” ,但并非真正的空白 ,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这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历史的诠释 ,从来就各有各的说法。斯大林在位时就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第28页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序:“据说 ,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第6页 ;《美庐深深》姚雪雪文 ,《纵横》月刊2005年第6期62页也记述这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 ,这是一般的公理。”(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红旗出版社第67页)叶利钦说 ,“历史最终还是由个人来撰写的”(《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第440页)。斯大林还说过“有人就有问题 ,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3页)希特勒则说 ,没有一个人敢问战胜者 ,你过去说的话是真是假。(一时未找出原报刊 ,仅记其大意如此)但是 ,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姑娘 ,你爱怎么打扮 ,就怎么去打扮”得了的吗?“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岗说得好 :‘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 ,正如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 ,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 ,不容许别人说谎行骗。’林肯也曾说过 ,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 ,你也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穆欣 :《〈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见《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349页 ;《世纪》双月刊2000年6期26页 ,首次披述这个理念)今天 ,我们从卡廷事件的演绎 ,恰恰证明前提与结论之间那种联系的必然性 ,即是说只要前提是真 ,推理方式正确 ,就一定得到真正的结论 ,否则相反。这是由于历史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 ,一经发生 ,它就永远独立存在。它可能被掩盖、被歪曲、被篡改 ,甚至被重新杜撰 ,但当岁月的狂飚消散流逝、历史风云的尘埃飘逸落定 ,后人便会从一片片破碎的遗存中去掇拾历史 ,这时候 ,历史就被还原 ,被再现 ,“假的就是假的” ,伪装终会剥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人 ,面对过去的一切事件 ,他绝不能总是沿袭现成的结论 ,而是本着“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挽梁漱溟联)那种不去回避真相、捂盖子的精神和胆魄、勇于披寻历史的本源。决疑之后 ,面折直

声。如过去一谈及张作霖之死 ,人们都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但俄国历史学家普罗霍夫在其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证实“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 ,转引自《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因为刘大使自己就深谙“谎言腿短 ,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 / 谎言腿短 ,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 / 但 ,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 / 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所以 ,在1985年11月1日波兰亡灵节那天 ,作为驻波兰大使的刘彦顺 ,在阴雨连绵中走到公墓园里 ,目睹某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 ,好像无人祭扫 ,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了鲜花和点燃的蜡烛 ,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 ,这就是真与伪、亲与疏、爱与恨的“特殊形式的公决” ,所写下的诗章 ,感到当年屈死了的英雄并没有死 ,他们依然活在后人的心中 ,而那些当年叱咤一时风云的“人物” ,死后也和生前一样都遭到人们的唾弃。这真正验证了我国民众对一切历史暴君“骨朽人间骂未销”同样的况味。作为一个使者 ,今天竟能把这个异国的冤狱 ,以自己的见证和思考直声国人 :强权和谎言 ,虽得逞于一时 ,却不能得益于永远 ,结果既损人又害己 ,而作为劣势地位的国家敢不敢在强权面前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 ,也是一个最准确的检验。——确实 ,其人已矣 ,“不暇自哀” ,却颇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约翰·肯尼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 ,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 ,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 ,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但我觉得 ,敢于追怀一切屈死和冤死的英雄 ,固然值得我们后人致敬 ,而唤醒人民对这些历史的不幸去进行深切的反思 ,就更难得、更可贵 !基于此 ,就使人们觉得刘大使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真实的历史永远是留驻在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心中 ,永远不会被流逝的时光所冲掉些儿 !它就激发一切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一代代去披寻、掇拾 ,从而去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

(作者为北海中国工商银行分行党组成员、副行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彭涛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访姚依林

● 彭定安

1979年冬季的一个明朗的下午,我就一二·九运动的经过问题,访问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他详细地谈了他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并交给我一份打字材料,允许我加以引用。

事情的原委和经过是这样的。彭涛的故乡江西鄱阳县的县委邀请我为县党史办采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彭涛传记,因为我是彭涛的弟弟。——彭涛原名彭定乾,我们本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但因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就与家庭失去联系,家里以为他已经牺牲,故将我过继伯父家。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就由沈阳赶赴北京,先后访问了谷景生、郭明秋、李雪峰、孙敬文、宋黎、高惠如(彭涛夫人)等老同志,最后访问了姚依林同志。

1979年11月14日下午4时,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达中南海姚依林同志的办公室。秘书先让我在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小会议室落座,不一会姚依林就出来了。我们相邻而坐。因为事先已经约好访谈的主题,所以,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彭涛实际上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听了他的话,感到一种兴奋和惊讶,因为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提法。然后,他递给我一份打印材料,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再谈。”我当即紧张急速地看完这份姚依林回忆一二·九运动经过的材料,感到不少情况,同常见的历史记载不同。于是,我首先便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说:“这份材料里的回忆,同现有的历史书上的记载,不完全相同。是否应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很快干脆地回答说:“应该按历史本来的面目反映。”然后我又问:“您这份材料准备发表吗?”他说:“不准备发表。”我再问:“那我可以在我将来要写的文章中,引用这份材料吗?”他痛快地回答说:“可以引用。”过后又补充说:“你的文章发表前,寄给我看看。”

我答应一定照办。

然后,姚依林同志又做了一些口头补充。他说:“当时,学生力量大的是燕京、清华,所以,组织游行时,原计划从清华、燕京出发,一路上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进来,不断扩大队伍。但是,没有预计到敌人关城门,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没有能够进城,后来主要靠东北大学。”他还补充说:“一二·九当天,成立了指挥部,我和郭明秋指挥,孙敬文当交通。指挥部设在北亚咖啡馆。在游行队伍里是黄敬指挥。后来,在新华门请愿后,举行示威,我们去到游行队伍中。彭涛作为领导人没有公开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然后,姚依林同志又谈到材料中没有写到的、运动经过以外的事情。他说,一二·九运动当时,“主要领导人是彭涛同志。经验丰富的是黄敬。政治上更成熟一些的是周小舟。”接着,他解释说:“但周小舟当时主要抓‘武委会’(按即‘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简称)的工作,他除了参加讨论酝酿发动‘华北水灾赈济活动’即后来的一二·九运动的‘西山会议’外,以后再未参加活动。”他又说:“黄敬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当时刚从狱中出来,从青岛来到北平,在北大数学系就读,党的关系还没有接上。所以这时还没有参加北平市委的工作。”接着,他又告诉我说:“当时年龄最大的是小舟,那时他26岁,年龄最小的是我,十八岁。”

看了姚依林同志的材料,又听了他的谈话,我有了一点疑问,便大胆地提出。我说:“就我读到的历史记载来看,以及人们普遍的认识,都是认为黄敬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和代表人物。这种‘历史的误会’是怎样造成的呢?”姚依林同志略加思索,回答说:“彭涛在一二·九游行中一直没有出面。而黄敬是游行队伍的指挥。特别是,在游行中他曾站在有轨电车后面的铁梯上讲

演,被记者照了下来,发表了,这张照片影响很大。”的确,这张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征,在全国以至世界上都流传甚广,人们都熟悉这张照片、熟悉照片上的人,以至一提到一二·九就会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黄敬。因为我提起了这个话题,引发了姚依林同志的回忆,他接着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黄敬作为一二·九的代表人物,当选中央委员。那天会上,我和彭涛坐在一起,看到选举结果,我便说‘他怎么成了一二·九的代表呢?’彭涛说‘我们不要提这个事’。”时间过去大约一个小时了,访谈到此结束,我告辞退出,踏着夜色离开中南海。

来 函 照 登

尊敬的编辑同志大鉴:

顷读贵刊2009年第8期,于第64—68页发表《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一文,署名“彭定安”,我不胜惊诧!这是一次严重的编辑工作的失误。

我曾向贵刊投稿,题目是《访问姚依林》,那是在1979年访问姚依林同志的访问记,同时,附寄了姚依林在与我谈话时,交给我的一份他本人的谈话记录的复印件,即《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上午)》,文末记录:“记录稿经本人审阅/整理人:杨树先/访问人: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唐纪名、杨树先、王冬琳、许克清”。后来,贵刊回复我说:你的文章已经发表过,我们不用了。我即回信说,拙稿贵刊不用,我同意;必须声明:我附寄的复印件是发表过,但我的访问记却未曾发表过。非常意外,事情已经过去很久,现在突然用我的名义发表别人记录的访问记!不知实情者,还以为是我欺世盗名!

我特此向你们言明实情,同时恳请你们在刊物上郑重更正。还希望你们能够发表我的稿件,以呈明事情的原委。

发生了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心中的感受,难于言表。恳切地请求你们尽快在贵刊作出相应的处理。区区此心,切盼谅解!

彭定安敬上

2009年8月9日

我从北京回到沈阳后,就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彭涛与一二·九运动》,并按姚依林同志的嘱咐寄给他审阅。很快,他就在原稿上批示同意发表,退回我。我即寄《人民日报》。因为文章中提到刘少奇对一二·九运动的肯定,以及在运动展开后北方局即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等,所以,编辑部回信说,由于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文章暂不能发表。后来,我便交给《辽宁日报》于1980年7月3日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我根据姚依林同志所谈和打字稿中的记录,记叙了一二·九运动的过程。

编辑附言:

我们因工作疏忽,造成署名错误。谨此向原作者和彭定安先生致歉!

2009年8月10日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2009年第8期中关于《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中倒数第十三段:“‘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于是黄敬才去敲起钟来”中的内容有误。

经我本人回忆,实际情况为:汪德昭(是我北大史学系同学)听到游行队伍经过北大红楼时,仓促从课堂中跑到楼下打钟。所以北大参加“一二·九”游行是临时参加的。

我从事后了解到,当时北平市学联派人来北大通知时,并没有找到我。请贵刊给予更正。

刘导生/2009年8月31日

《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第64页第6段提到当时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云:当时有两个口号:“Per Esperanto por peace”和“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我正好是世界语者,看出其中有一点错误。“Per Esperanto por peace”(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和平”)中的“peace”(和平)是英文,不是世界语词汇,正确的词是“paco”。故此口号应为“Per Esperanto por paco”。“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社会主义”)中“Por”和“Socialismo”两词的第一个字母都不用大写。这个口号写成“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即可。不知是作者误记,还是编辑部误写。以前也曾注意到一些文章中的外文词出现错误。特提出,请编辑部在审稿时注意。

郑伯承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

• 尹曙生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

(上接第75页)认为自己不方便参加,便建议中央另选代表出席,而且为这件事先后两次上书蒋介石,并函各方面提出意见。代表团团长郑彦棻临行前往戴季陶处请示意见,他指示郑等人要慎言行,要加强与亚洲各国代表的联系,关于西藏问题,最好能把他们列入中国代表团。后来,中国代表团赴印,正好和印度所邀的西藏代表同日同机抵达新德里。中国代表团抵达印度后,立即向印度提出交涉,表明中方立场,决不容许印度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由于中方的义正词严,印度终于没把西藏列为独立国家,而只是以地方代表列席大会。

在正式开会之前,又发生一个插曲。当时,代

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本文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正

本刊今年第8期19页左栏倒数第4行提到的林润青应为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第9期66页左栏第4段中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应为千分比数。

代表团团长郑彦棻发现预备会议会场中所悬挂的世界地图,把西藏列在我国国界之外,便立即向尼赫鲁交涉,起初他敷衍推诿,后来答应予以改正。但开会当天的上午,还未改正。中方代表团便派叶公超找尼赫鲁再度直接交涉,表示如果不改正,中国代表团便不参加开幕式。印度方面知道中方立场坚定后,才同意由叶公超亲自将地图上中国国界改正过来,把西藏包括在中国国界之内。郑彦棻后来回忆说,戴季陶对此事处理的远见和指示,维护祖国统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生命的暗夜

● 陆晓娅

很久不曾失眠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肩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50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知道我的文章掀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文革”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不就是“革命”的对象,要不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可以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地主”,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

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克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的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达”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旁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劳改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



1978年校庆时和老师、同学在礼堂前合影。1966年8月的那个下午,就在这个礼堂前发生过毒打老师的暴行。前排左二为作者陆晓娅。

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说“×××(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四十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

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结束,快点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

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

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陆晓娅(陆小娅),1953年出生。“文革”开始时是北京育英学校六年级学生,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6年中学老师和27年报社编辑,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过副刊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91年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项目“青春热线”。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博士完成心理咨询硕士班和博士班学业,现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2008年退休后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任总干事。曾出版过《活出新感觉》、《横渡死亡之海》、《改变从心开始》等书。

(责任编辑 吴思)

(上接69页)领导未能根据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改动,不仅文字表达婉转得多,而且进一步点明了责任所在,读起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这份内参同样是以“增刊”发给项南书记。

至此项南书记完全纠正了自己的决定,法官的儿子也很快伏法了。《福建日报》还以“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为题作了公开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盼望公正执法的要求如愿实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好评。

当前,新闻界普遍感到舆论监督难,但难在何处?回忆项南书记与舆论监督的这件往事,结合自己多年的新闻采访实践,引发了我以下几点思考:

舆论监督难不难,首先还是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态度,如果我们现任的党政领导都能像项南书记一样重视舆论监督、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不管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属下的监督与批评,都能做到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坚决改之,也就是采取真实的、真诚的欢迎和鼓励的态度,再难也就不难了。

其次,舆论监督能不能开展起来,与新闻媒介负责人的责任心密切相关,这就是上述林振夏总编说的一句话“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新闻舆论开展批评与监督,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新

闻舆论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不可讳言,这些年因受舆论监督环境难的影响,不少媒介负责人也缺失这方面的责任心,甚至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是很支持属下的记者介入监督与批评,尤其是对所在地或顶头上司的监督与批评更是视若禁区。我想,如果各种媒介的大小总编们都能学习林振夏总编的这种责任心和精神,舆论监督难的局面是会大大改观的。

再则,广大新闻从业者的敬业精神和深入作风也是开展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保证。不可避免的是,随着新闻媒体从计划经济时代吃财政饭,到如今进入市场经济直接参与竞争,迫于媒体的生存压力或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媒体及记者开展舆论监督的动机出现了异化的趋势,甚至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感染,有的被当成胁迫有偿新闻或不当收入的武器和手段,这实在是新闻界本身的一大悲哀,也严重削弱了舆论监督在党和政府及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民间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戏言虽是夸大其词,肯定不是准确的,但也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民心。

(作者为福建日报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项南支持舆论监督

• 张玉钟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时听取项南汇报福建工作

项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主政福建的政绩,福建人至今有口皆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念之情可说越来越浓厚。一个省委书记如此深得人心真是难能可贵。当年我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省报记者,不可能与他有多少接触,但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却使我对他敬佩终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分配到《福建日报》驻福州记者站工作不久,就参预了一个重大案件的调查,连续采写了3篇内参,以“增刊”直接向项南书记反映他自己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项南书记了解实际情况后,不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决定,而且亲自打电话给报社总编林振夏,向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记者进行追踪调查。当年我知道了项南的态度后,真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如此虚怀若谷十分激动,但因此事涉及的内情重大、尤其是涉及到

高层领导,作为当事记者我对外一直守口如瓶保密至今。我想,此事已经过去26年了,今天我把其来龙去脉简要“解密”于此,不仅为了怀念和学习项南的高贵品质,也许还有许多方面可引人思考。

1983年8月4日,福建省体工队膳食科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长,惨遭社会上4个歹徒杀害。事件一开始就纷纭复杂,是因为双方的身份都有点“特别”。被害者的父亲是原国民党“重庆号”起义将领之一,两个哥哥一个在印尼、一个在香港,这种身份自然引起省市领导的“特别”重视。而杀人的主犯之一的父亲是省高级法院的一个法官,当时又正逢“严打”时期,因此知情人“特别”关心这个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判决。我作为记者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了解到这个案情也引起了“特别”的兴趣,马上向记者处处长卢秀启和总编辑林振夏作了汇报,他们都明确支持我介入采访,我随即写了第一份内参《发生在省体工队的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

果然,随着办案进展出现了许多扑朔迷离的情况,尤其是进入量刑阶段,省市两级法院办案人员及领导,在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的问题上产生了对立的意见及尖锐的斗争,而且由于有人在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时巧妙地做了手脚,致使省委、市委两级领导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也就是省委领导改变了市委的决定,有关办案人和知情人对此反映强烈,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记者通过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认为省委领导,实际上就是项南书记在这件事上的表态是错误的,而福州市委的决定恰恰是正确的。得出这个看法后,我当时真是惊出一身冷汗,敢不敢写成内参向项南直接反映呢?我当即向林振夏总编汇报,林振夏认真、详细听后问我:“你这个

看法有把握吗？”我答说：“从掌握到的情况看应该有把握。”我又问林振夏：“如果写成内参，事实上等于直接批评项南，他会接受吗？如果不接受，我们会闯祸的，怎么办？”林振夏沉思了片刻说：“不会的，项南同志是好书记，主要的原因是下面人捣鬼，如果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会纠正的。你还是写出来吧！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林振夏总编说的很慢，但一句一句至今还刻在我的心头，他虽然1994年逝世至今15年了，但这一幕经常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真为一个省委机关报总编辑强烈的责任心和无私无畏的胆略佩服得五体投地。

由于得到林振夏总编的支持，我很快写出此事的第二份内参《省法院一干部的儿子该不该杀的问题要认真对待》，林振夏亲自审定稿件并批准以“增刊”直接发给项南书记。这份约1200字的内参，第一段即反映了这个案件进入量刑判决阶段，“经省法院向省委汇报后研究决定”，改变了福州市委的意见，把法官的儿子从死刑改为死缓二年。紧接着写道“对这一改判，知情者反映强烈”，并具体引用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的看法：“对致死人命的直接凶手、认罪态度又恶劣的改判为死缓二年是量刑不当，必须复议”。接着文中列举了这位审判员掌握的材料，说明“省法院有关人员向省委汇报时认定改判的唯一理由‘投案自首’是不符合事实的。”最后一段写道：“记者认为，审判员某某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而省高级法院有关人员的态度很需要认真查一查，这关系到这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取信于民的问题。”

项南书记看到这份内参后高度重视，专门打电话给林振夏总编，对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要记者继续就办案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进行调查，再写一份内参向他汇报。林振夏为此专门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大胆完成省委书记交办的任务，还就采访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交待。我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原来是学中文的，法律底子薄弱，又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缺乏采访重大事件的经验，只好一边进行采访，一边找来许多刑法方面的书籍急补，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采访，走访了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委领导和一二审的办案人员，搜集到了大量的、充分的材料。采访中，“福州市

中级法院和省检察院提出了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中一些做法不妥当”。记者在基本掌握情况后，向省高级法院领导提出采访要求，这之前他们也接到省里要他们接受记者采访的指示（但这个指示是项南书记直接打电话还是其他人打电话我就知道了），因此省高院领导非常重视记者的采访，正副院长等党组成员（记得共8位）全部到场，面对记者一个人采访，这是记者36年新闻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接着又采访了省高院的办案人员，我把他们不正常的做法归纳为4大问题，有的放矢提出来，他们的当场回答进一步证实了问题确实存在。回来后，我即写出了此事的第三份内参，长达约4500字，题为《关于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一些不正常做法的调查》。林振夏总编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我把稿件送去他亲自修改定稿。其中他修改的一句令我一辈子奉为文字锤炼的楷模。我提出的4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是这样写的：“9月1日省法院领导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不全面，只汇报×××‘投案’，而没有汇报‘不自首’，致使省委领导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整句话从表达的内容和语法上看都是对的，但林振夏却把最后一句改为“致使省委（下转67页）



1960年项南在北京中阿公社

理论超前的经济学家董辅初

● 张素芳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起到2004年逝世，从事经济科学研究近六十年。从1959年出版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一书之后，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中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有深入扎实的研究和独到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中，率先提出了一整套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他为改革所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还有屡吃苦头的代价和牺牲。

石破天惊的所有制改革理论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董辅初应邀作报告。他讲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下，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力；“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了国家的一级政权，国家通过各级政权组织直接向人民公社下达计划指令，农村集体经济也由国家所支配而失去了根据自身经济利益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的集体性质。国家所有制企业和人民公社都由国家行政组织所任命的干部直接指挥它们的经济活动，这些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与企业 and 人民公社的经营状况没有利害关系，不承担经济责任，群众对他们没有任免的权力，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按长官意志”办事，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违背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提出，必须改变全民所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所采取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为此，必须使国家政权这一行政组织和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分开，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重新建立乡镇政权，赋予社会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力和经济利益。

董辅初公开向国家所有制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提出挑战，使在场的听众都惊呆了。报告会后，一位经济研究所的老先生对董辅初说：你的胆子真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毛主席提出的。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好心，他深深地为董辅初捏把汗。屡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冲击的董辅初，当然也清楚公开提出这样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但他无所畏惧。为了充分阐明自己的这一见解，他又把讲话稿写成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

果然，事后有人大做文章。在全国批判精神污染的政治大气候中，董辅初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面对有人逼迫他检讨，董辅初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严辞拒绝说：我没有错误，我不检讨。那些人没办法，只好又说，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董辅初说：片面性也没有。董辅初刚直不阿，胸怀坦荡，坚持真理，表现出献身科学的勇气和胆识。

谁知，七、八年之后，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公认的了，当时逼董辅初检讨的人却当着董辅初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他提得太早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提对了，但提早了也总是问题。

是的，董辅初提出所有制改革确实太早了！当时，虽然真理标准的讨论徐徐吹起了思想解放的春风，但研究禁区森严，学术仍无自由，迷信胜过科学，统治人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国家所有制

理论根深蒂固,被认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他居然敢于向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挑战,公然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胆识确实惊天动地!他提出这些见解,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早三个月,并且后来逐步成为改革的实践。比如,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设的改革;1984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政企不分、企业成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状况,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此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再如,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与董辅初1978年9月提出改革公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连文字表述都大体相同,可董辅初却早提出近20年!他提得早,正是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的独到的理论贡献,说明他具有深厚、博学的理论素养和对现实经济社会敏锐、深透的洞察力,更有探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和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勇气。

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

改革初期,关于改革目标的争论,集中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董辅初在1980年的一个演讲报告中,鲜明地表示不赞成两个调节,即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主张一个调节,即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他在1981年元月所写的一文中,揭示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排斥市场机制,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准确的经济信息,缺乏灵敏的反馈机制,不能自动地纠正计划决策的失误,在资源配置上难免人为地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旧体制的根本弊端,提出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意向。

1981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少数人开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征求意见,这一稿子将提交中共中央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后作为决议下发。董辅初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提法。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应该为今后的改革留更大的余地,这样的提法会使将来不好推进改革,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既然是组织开会对文件稿征求意见,与会者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都应该是允许的。可是,此时虽然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讨论热烈,但官方对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太多的肯定。董辅初的发言又被某些人记上了账,被定为是“南斯拉夫观点”,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是遭到激烈批判的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这成为董辅初的又一大“理论错误”,他为此再一次吃了不小的苦头。

多次为自己提出超前的正确的理论观点而吃苦头的董辅初,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看破了名利得失,以更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身于经济理论研究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只能由计划来调节,计划调节更不就是指令性计划调节,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1989年官方的提法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倒退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气候下,董辅初在一篇采访记中坚持: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硬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

董辅初是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他的理论观点,集中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下卷)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书中。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为我国确立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理论认识上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

1988年董辅初以其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干和群众信得过的人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他又被连选连任,继续担任同一职务。199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

这两个岗位上的15年中,他作为经济学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表了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做了大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

1992年底,董辅初从各地纷纷上项目、争贷款,致使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原材料紧缺和利率猛涨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敏锐地洞悉了经济过热的发展势头,对经济形势概括了四句话:现在的经济已经出现了部分过热;现在的经济还没有全面过热;经济有向全面过热的发展趋势;通过调控,可以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在1993年初的人代会上,他指出,我国经济固然需要快速发展,但发展需要相应的条件才能支撑,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交通和资金都很紧缺,根本不可能支撑过快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发展太快、投资太猛,必然引起价格猛涨,导致银行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生活发生混乱,这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损失。当时正值全国经济发展的热头上,大家都热衷于大干快上,董辅初冷静地说出这番话,当然又“不合时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果然,正如董辅初所言,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跃为14.2%,而1991年只有9.2%;投资增长42.6%;各项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致使物价上涨率由1991年的2.9%上升到1993年的13.2%,1993年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6%。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但此时,经济过热的势头已经很难遏制,1994年物价更上涨了21.7%,迫使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紧缩的调控政策。

在1994年的人代会上,董辅初又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一直紧,因为一直紧对于经济发展不利;也不能一直松,因为一直松又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松和紧要交替进行。他主张:第一,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使其生产正常运转,以遏制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二,通过增加生产和进口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以保持物价稳定。

1996年,董辅初在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会上

发言,再次明确指出,现在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政策应该适当放松,以增加财政投入,银行也应配合财政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财政应当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没有什么风险,而我国这方面也很薄弱。这可以防止经济的连续下滑,对经济的增长也有好处。他的发言当时就遭到有的人反对,说是“罗斯福新政”。这些人想不到后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果然又被董辅初所言中。

1998年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讨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财政和金融的会上,董辅初又分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基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今年的财政应该是放松的财政,应该增加财政的投入,不应该减少一百亿的赤字,而是需要更多地发行国债。对于银行,他提出不要再坚持“适度从紧”,应该放松,银行应该配合财政,增加流动资金贷款。他的这些意见虽然正确,不少人表示应该采纳,但指标已经定下不可能更改。后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实施了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增加投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8月,又作出了增发1000亿元国债和银行配套增加1000亿元贷款的决定,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刺激经济增长。实践又一次证明,董辅初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都是正确的。

董辅初总是超前提出正确的见解,并因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吃了不少苦头。面对强大的压力,他始终坚持真理,从未低头弯腰,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次记者采访他:你的正确观点是给国家、给社会、给改革带来了好处,而你却是不断地吃苦头,被误解,受到很大损失。那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到底图什么?董辅初说:“图什么?我认为不是图什么,不图什么。自己虽然为这些吃了些苦头,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我的使命就是进行经济研究,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很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应该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到底对还是不对,通过实践去检验,因为谁也不敢说自己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去讲它,甚

至于我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一些别人爱听的事情,这样也许自己可以得到重视啊,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情况常常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值。从我的人格上我就接受不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上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家基本的素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就是董辅弼敢于冒天大的风险一次又一次率先提出超前的改革理论的动因,也是他能够对于我国的经济科学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成功之道!

董辅弼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我们要继承先生的遗志,为彻底完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彻底铲除使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为像他那样的经济学家和每一个公民,不再因为提出了超前理论和个人见解受压力、吃苦头,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作者为《求是》杂志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党史札记末编	龚育之	32.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潜规则》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秘密。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胡乔木、周扬、丁玲、夏衍、胡风等文化思想界名人六十多封信札,述及 1949 年到 80 年代文化思想界的大事。解读这些信件,成为重读文化思想界风云的新视角。

《走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直言》尝忆 50 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 80 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

——李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

• 李兴勇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素以知日著称，曾写过《日本论》，对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风俗有过精当的描述。殊不知戴季陶对印度也颇有研究，而且长期热心于发展中印文化交流，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贡献。

创立中印学会

早在辛亥革命前，戴季陶就特别喜爱印度泰戈尔大师的作品，曾翻译其诗文，登载在《天铎报》上。五四时期，戴季陶因敬慕甘地大师的为人，译其文并作诗歌颂，登载在1919年的《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上。甘地本名摩诃塔摩，戴季陶将其介绍给中国人时，经过审慎思考，最后将他译为甘地二字，以显示圣雄甘地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的弘誓大愿，此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鉴于中印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和近代两国

共同的境遇，戴季陶对中印文化交流特别重视。1933年6月间，在印度讲学数年的谭云山在与戴季陶的交谈中，慨叹中印文化的衰落疏离，产生联合印度振兴中印文化的愿望，戴季陶当时就对其设想予以支持。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归来，关于中印学会的事，已与印度方面接洽完成，商定由泰戈尔负责印度方面的组织工作，中国方面，由戴季陶负责组织。戴季陶考虑到中、印、英三国的关系，为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他主张：“目前中印文化之联络，只能限于文化，尤以偏于宗教文化为宜，若稍涉及政治，结果必不好。”据此方针，他指示中国的中印学会，“在第一期工作中，绝对不作宣传，到第二期功夫开始时，方可将第一期工作情形发表。（亦无须取现代式之宣传）以后三期四期均如是，自然于无形中，为政治经济工商业等一切国民生活，均有莫大好处。”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为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避免过多的政治色彩，此会推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为理事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1935年前后，大量中国书籍分批运送到印度。1937年3月，印度国际大学中的中国学院成立。戴季陶为中印文化合作取得初步成就而欣喜，与蔡元培以中印学会理监事长名义，致电泰戈尔表示欣慰，并声明“愿共同努力，发扬东

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人类于和平幸福之域，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印度方面的学会自 1943 年后，每年 12 月举行会员大会，戴季陶皆致电或致函，以表示祝贺，直至 1949 年逝世为止。戴季陶为推进中印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赢得了印度方面的信任和敬重。在中印学会成立之前，戴季陶就被推为印度国际大学的七人护法（相当于中国的大学董事会董事）之一。1946 年波罗尼斯大学赠予他最高学位，1947 年印度大学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两大学均邀请其到印度参加赠予典礼等一系列活动，戴季陶均因身体有病而未能前往。

战时出访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苦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素知中印文化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于是寄希望于蒋介石派人前往做缓和作。正因为戴季陶在中印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1940 年他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出访印度。戴季陶于 1940 年 10 月 19 日飞往缅甸仰光，转飞印度。戴季陶一行于 1940 年 11 月 18 日抵达印度新德里，印度方面对戴季陶的来访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正在狱中的尼赫鲁特地写了题为《一位贵宾》的欢迎文章，文中说：“我代表印度人民，向他敬致热烈的欢迎。……他负着友谊访问印度的使命，也是中印两国友谊日益密切的象征。相信他的这次来访，在促进中印两民族的密切友谊上，收到硕大的效果。”尼赫鲁还在另一篇《印度与中国》的文中，主张以亚洲诸国组成一个东方联邦，以摆脱大国的控制。他对滇缅公路的一度被封锁表示愤懑，建议修筑一条铁路，从中国边界直通印度阿萨密的萨的亚，以便将大量的物资从孟加拉运来中国。

戴季陶在印度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访问活动。11 月 10 日在加尔各答，戴季陶与 80 高龄、重病新愈的泰戈尔促膝长谈，相见如故。11 月 28 日前往孟买，拜见甘地大师，并在其家住了三天，两人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还曾到尼赫鲁的家中，专程看望了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著名女外交家，世界上第一个女部长，第一个驻联合国女大使，第一位联合国大会女主

席），并前往阿南德宫拜访尼赫鲁唯一的后代英迪拉。12 月 9 日，戴季陶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尼克坦国际大学，该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泰戈尔因病未能出席，仍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高度评价了戴季陶的来访及中国抗日的正义战争，称戴季陶“光临鄙校，实为中印两国悠久文化，重新发生密切关系划另一新阶段。……现下，我愈深切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光荣胜利的渡过当前的困难，中国将以精神战胜侵略的事迹，昭示于现代”。应校方的邀请，戴季陶对国际大学的学生作了题为《中印两国文化兴衰离合因缘颂》的讲演，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在访问波罗尼斯市时，正值摩诃菩提会年会召开之际，戴季陶被推为大会主席。会后，波罗尼斯市市民为迎接戴季陶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戴季陶被请坐在高高的大象上，由鲜花、音乐、歌舞簇拥，在市区缓缓而行。波罗尼斯市离印度圣地鹿苑旧址不远，戴季陶特地参拜了这个初转法轮圣地，并捐赠福舍两幢，种了 500 棵菩提树以示纪念。

1940 年 12 月中旬，戴季陶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这次访问，前后达两个多月，行程近两万余里，戴季陶“东起加尔各答，西至孟买，北至德里，南至海德拉巴，处处都受到印度人民的欢迎，和印度各个宗教、各个族姓、各个阶级、各种职业的人，有极亲切的往来”，并赢得了印度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敬重。戴季陶出访印度，使英印矛盾得到缓和，也广泛争取到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并为 1942 年蒋介石出访印度和中印互派使节做了先期准备工作。

维护祖国统一

戴季陶在努力促进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同时，能够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不做无原则的交易。1947 年尼赫鲁发起召开泛亚细亚会议，邀请亚洲各国民间代表于 3 月前往新德里，商讨亚洲有关的共同问题。尼赫鲁也邀请戴季陶参加，并邀请国民党和各团体代表参加。戴季陶认为召开泛亚会议，促进亚洲团结，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他起初准备参加，后来发觉印度竟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显然是别有用心（下接第 63 页）

列宁《政治遗嘱》的风波

• 尹彦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谓他的《政治遗嘱》。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病情的突然恶化。尤其是12月23日凌晨,“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早前列宁已对机关、尤其是斯大林负责的工农检察院极为不满,同时在对外贸易垄断与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产生较大分歧,他发觉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利于防止党的分裂,所以遗嘱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两点,首先就是扩大中央委员会完善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以“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上调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的认识有分歧,而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斯大林则千方百计的监视病中的列宁的一举一动、一信一函。列宁口授遗嘱的公布一波三折,而遗嘱的执行则是血雨腥风,连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未幸免于难。这里我们只着重分析遗嘱产生的前前后后。

一、列宁口授遗嘱的监视与阻挠

1921年年底列宁病重出现最初症候,在党中央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这时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注1}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得了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12月13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12月23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注2}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在这之前,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曾专门作出决定:

“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注3}

这样斯大林成了列宁的监护人。“个人负责断绝”、“监督执行医生的规定”,这里有什么玄机呢?列宁病重,最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的是斯大林。政治局其他一些人也害怕列宁会让托洛茨基接班。所以才作出这样严格的决定。所谓“断绝”,主要是断绝列与托的接近。

列宁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以“完全拒绝”相要挟,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但并不顺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

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不应带有通信的性质;

第二,禁止会客;

第三,医生为病人开处方和作建议,需要和斯大林协商。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

第四,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注4}这四条全是《列宁全集》后面《年表》的文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卷,第232页

第五,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还严禁列宁打电话。”^{注5}

防止刺激列宁大怒、大激动是必要的,但是为什么不能通信、会客、谈政治,甚至连“家属”也不能向伟大的政治家谈政治?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经医生允许后,记录了列宁1922年12月21日给托洛茨基的信”。这可惹怒了斯大林,立即怒斥。使她“受到极大刺激,她完全失常了,号啕大哭,满地打滚”,^{注6}如此不近情理的限制与监督列宁的活动,显然是担心自己的职位丢失。^注

7

国内政治条件越来越令人担忧,是《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原因,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到列宁写遗嘱前十天,他的批评更尖锐了:“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甚至说:“国家机关是异己的。”^{注8}这里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党中央所属的各部委。这些是委派制造成的。还有权力太集中。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作为,列宁是不满的,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注9}“最有害的就是急躁”。这些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从解密的苏联档案看还有更重要的。列宁认定斯大林“他根本没有头脑”,列宁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生气”,而且是列宁对“斯大林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见《苏联历史档案》第二卷,275—277页),所谓“根本没有头脑”,是相较而言的。没有思想家、理论家的头脑?还是与托洛茨基比较没有头脑?列宁从1902年就已十分赏识才华出众的托洛茨基,虽然后来产生分歧,但十月革命前后,托对列亦步亦趋。而不时要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抵制,甚至公开反对,斯大林只是后来才完全站到列宁一边。到了要交班的时候,是交给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呢?托的自传中说,列宁亲口告诉他,希望他能接班,但被他坚拒。后面还将有专文谈这件事。由于斯、季、加等人嫉恨在才智与功勋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托洛茨基,所以列宁口授遗嘱受到斯大林严密监视与阻挠,也就不奇怪了。

二、关于扩大中央委员会认识上的分歧与斗争

一党执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改革,很自然地会首先想到如何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入手,而且以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为核心。所以列宁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第一点就是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以防止党的分裂和以监督党政各个主要部门。

俄共八大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为19人—27人,基本由职业革命家集团组成,或者

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托洛茨基语),党的领袖更是由思想家、作家、政治家一类杰出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在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新的中央委员从哪里来呢?“要求工人阶级出50人—100个中央委员”。^{注10}“我是这样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注11}列宁“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并且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注12}因为他们已经染上官僚主义。显然列宁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的现状,使之与普通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结合起来,让他们监督决策。列宁认为这样做:第一,设置一个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及书记处的机构。第二,“提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第三,“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冲突分裂。”“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总之想让工农群众的代表能够监督党的最上层领袖人物,以制约过分集中的权力。制约“极端集中制”。还有一点重要的,又不便明言的,卢森堡等人对于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批评为“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换成托洛茨基的话,即少数知识份子专政。让大量优秀工农分子进入中央,既是一种对外的驳正,也是使无产阶级专政名实相符。列宁的这个建议,口授于1922年12月23日,“当天即送达斯大林。”^{注13}可谓正中斯大林之下怀。因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必然出自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组织局的提名、选拔,这一来自然可以扩大自己的山头,多一些受自己控制的“人马”。所以,1923年1月29日,书记处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应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增加到50人,美其名为以“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中央全会的权力”。

托洛茨基经过研究,于1923年2月22日向中央全会提出一个系统的意见:《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显然这是他在了解了列宁的建议与斯大林的回应之后的一个较为系统的补充与反建议,他说他是始终捍卫列宁信中的基本思想的,但认为扩中委意味着效率降低,不仅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反而应当减少。他

说：

“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中央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中央委员会补充一些中央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会使中央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工作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建议:“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加上人数不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因此中央委员会的上述组成比现在的组成有所缩小,至少不会扩大。”^{注 14}

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的出发点,目的是不同的。

列宁是从增强工农分子对中央最高层的监督出发,并且试图为中央最高层设置监督机构,因而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为此,他还有另外的系统补充建议:使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与扩大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最终走上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以改变政治局内事实上已形成的无监督、无汇报,权力过分集中于斯大林的现象,从而将加强对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监督。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思路并不同意,他从保证中央高层决策效率出发,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作为决策、指挥机构,岂能庞大?

斯大林更多地考虑到拉帮结派、壮大自己山头的利益,同意扩大中央委员会。

列宁的主张,其愿望固然美好,但实践证明是空想。中央委员会虽然增加些纯朴的工农分子,由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不了解真相,缺乏判断的经验与足够信息、智力、能力,用今天的话说,毫无“政治资源”。他们能否起监督的作用呢?如果他们也参预决策,岂不会影响“准确性、正确性、及时性”?托洛茨基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所缩小,但由谁来监督这缩小的领袖集团呢?谁来监督权力中心: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呢?看来胜利者是斯大林。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中委、中监委,扩大党代表大会,一步步把他们变得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人物,或者干脆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如果说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种决策与监督机构的联合体,

它还能起到监督制约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作用,甚至还可以制约列宁、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那么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监督制约的作用,它既不能监督政治局、组织局,更不能监督书记处,不仅没有防止冲突与分裂,反而加速了冲突与分裂。而且酿成一二十年之后斯大林的血腥镇压。

三、把斯大林调开的明争暗斗

不“稳定”、“分裂的危险”在哪里呢?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注 15}接着列宁向代表大会分析了当时六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缺陷,并着重分析介绍了“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与托的缺陷。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注 16}

当时不仅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托洛茨基也身居要职,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而且还是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和海运人民委员,也



安息在红场上的列宁

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托洛茨基当时还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托付的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加之托的功勋远在其他领袖之上,其名望仅次于列宁,因此,有大批拥戴者。所以斯、托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党与国家的稳定与不稳定,团结与分裂。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

所谓“分裂”,当时可能的“分裂”形式有三:一是党与工人阶级式的分裂。1922年2月26日,工人反对派向共产国际告状的《22人声明》中,就谈到这种形式的“分裂”。即党反对工人阶级中“敢于坚持自己见解人”的“分裂”,党脱离自己代表的阶级的“分裂”。二是列宁此时所谓的“分裂”,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列宁信上还提到第三种分裂形式,即工农两个阶级式的“分裂”,但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所以这种分裂在当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而列宁当时所设想的斯、托式的分裂,还仅仅类似他和马尔托夫式的“分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式的“分裂。”不久的事实果然证明了列宁“分裂”的预见。并且发生得很快。只不过它不是列宁与马尔托夫式的“分裂”,而是托洛茨基先是被驱逐出境,后是被暗杀,以及接着列宁的近卫军全部被枪毙、坐牢式的“分裂”,这种分裂看来是列宁做梦也没想到的。列宁的《信》即遗嘱,是分六次口授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3、24、25、26、29日与1923年1月4日)。如果说,开始时,列宁还没有下定撤去斯大林的决心,那么之后的十天,即1923年1月4日,终于建议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应加调离: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注17}

如果说列宁前面对斯、托的评价,是一种毁誉参半保持平衡的评论,那么,这里的建议,使天平一下子倾向托洛茨基了。加之列宁写的几篇最后书信和文章,四篇含有严厉批评斯大林的内容,而最厉害的是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工农检察院1919年3月至1922年4月是由斯大林负责的。可想而知,斯大林是何等惶惶不可终日了。

到了列宁发现斯大林粗暴辱骂其妻子的事

后,立即叫来速记员,口授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注18}

这里连“断绝关系”这样严厉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问题就不只是“调开”的问题,而且已经进而要“公开进攻”,“投掷炸弹”了(列宁秘书福季耶娃转述列宁的话^{注19})。

从1922年12月21日以来,列宁曾五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中央全会为外贸垄断等问题进行辩护,纠正斯大林等人的观点及决定。在给斯大林信的同天,又口授了另一封信,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请求托洛茨基为其辩护: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注20}

这样看来,让“现在最有才能的人”、公认的天才,当时仅次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托洛茨基接班,是顺理成章的推荐,但列宁没有推荐,似乎也不想作这样的推荐。列、托齐名,国内当时悬挂领袖像,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个别场合还有一位季诺维也夫)。国外更是列、托相提并论,因此不必多此一举。二是虽然列宁是十月革命的总决策人,但“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托的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语)。而在国内外战争中,托洛茨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功勋盖过其他

人,在调离斯大林总书记职位之后,再否定托的继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是列宁太小估了一党制下的委任制的负面作用。它使被委派者紧紧依附于委派者:察颜观色,唯命是从,甚至泯昧良心、扭曲理智,投委派者之所好。列宁设想托的才能与智慧、功勋与声望,自然在党代表大会上会赢得拥戴,领导权的转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岂知却生出许多节外之枝。列宁的《信》,实际上是列宁准备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为防备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代表大会而采取的措施。这批信列宁嘱咐作为绝密文件保存,但12月23日口授的文件当天即送达斯大林。为此列宁特别对秘书重申了保密规定。然而不久,政治局多数人就已经知道列宁调离斯大林的提议了^{注 21}从而使斯大林等人早有准备。同时,列宁又规定对信、文件进行密封,除了他本人可以启封外,在他死后则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启封。焉知1923年3月5日,列宁病情急转直下,丧失言语功能,已完全不能令人转交即将在4月份召开的十二大,不过,毕竟政治局是知道列宁给代表大会写了信的,所以1924年2月22日,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注 22}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的信,这样一来,只能延迟到十三大。因此十二大前后的中央全会、党代表大会并不知道有这封信。

这里有另外一个要破解的谜:按六大制定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所以总书记一职的任免,是属于中央全会的特权。为什么列宁将调离斯大林总书记一事,提交给党代表大会,而不是提交给中央全会呢?这说明列宁已经估计到自己的提议不会得到中央全会的批准。中央委员中反对托洛茨基的人占多数,尤其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人核心小组”竭力排挤托洛茨基。而如果提交党代表大会,那么列宁的提议是会被通过的。孰知斯大林的任命委派,已经造就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摇旗呐喊,又加上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出于私心的相助,让他击败了托洛茨基。同时,在处理列宁遗嘱的手法上,严重违背党章,即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采取政治局少数人取代中央委员会、取代党代表大会的方式。“总书记斯大林同志的助手”巴札诺夫,曾亲身经历了

十三大,他对列宁《信》的命运叙述,比托洛茨基准确、权威。他是这样说的:

“1924年5月21日,即十三大举行的前几天,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操纵全会以举手表决方式(?!),批准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全会还决定不在代表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只把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团长(?!),由他们向各代表团传达。会议这一决议故意说得含糊不清,从而使代表团团长可以简单地向代表们说一下要点(?!),而不必逐字逐句传达,列宁遗嘱就这样悄悄地解决了。”^{注 23}

本来应该“印发”给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的信,却变成“对中央全会特别会议”的“传达”,同时还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记录”,此其一;其二,本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的,却简化为举手表决;其三,本来该原原本本的传达,却变成简要地说一些要点;其四,传达中还加杂解释:斯大林同志愿意检讨与改正等等。这里可以看出,少数人是如何取代政治局与中央全会的,而中央全会又是如何取代党代表大会的。而托洛茨基推辞不在十三大作政治报告,不同意撤换斯大林,又极大帮了斯大林一把。斯大林的宝座就是这样保住的。有了不受监督的最高权力,就有了一切,一切一切都好办了。1925年1月,托的军权被解除,1925年5月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被流放……直至被斯大林派人暗杀。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说:“假如伊里奇(列宁)还活着,大概已经坐牢了。”政治局的其他领袖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一个个被排除中央。到了苏共十七大,许多代表面对集体化的恶果,想起了列宁的遗嘱,竟有三百人不投斯大林的票,按照差额选举的话,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当不上。在卡岗诺维奇的帮助下,隐瞒了选票的真情,这才又保住斯大林的宝座。当时斯大林还不宜于发作,只是过了一年多,斯大林开始报复,70%的中央委员,过半的十七大代表,成了枪下鬼、牢中囚。凡是早先谈论、当时谈论列宁遗嘱的人,都有坐牢、枪毙的可能。这场血腥镇压,殃及全国数十万人。从此人们禁若寒蝉,不知列宁遗嘱为何物。只是到了二十大,列宁的信才分

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出版了单行本,人们才开始渐渐了解遗嘱。^{注 24}

那么一直彻底了解遗嘱的前前后后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结果又如何呢?自然像对待托洛茨基那样对待她,是绝对不行的。在表面上对她还算尊重,苏共十三、十四大,她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五大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副教育委员。但有名无实,还经常受到教育委员的侮辱。在俄共十六大上,她无意谈到斯大林制度上的某些恶果,竟被赶下了台。1939年3月26日,是她的生日,她尝了尝斯大林送来的大蛋糕,中毒身亡。这没有妨碍斯大林指示要组织高规格的葬礼。就在葬礼后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一伙陌生人到死者家里搜查,将部分档案搜去。她的著作、书信,自然是不会出版的。^{注 25}

从撤换斯大林的建议看,列宁是接受教训的,他更慎重于领袖的个人品质了,但是教训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置若罔闻,他取自杀式的宽宏大量。他不听列宁不要跟斯大林等人搞“糟糕的妥协”的警告,而是反对撤换总书记,“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撤换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只是告诫斯大林,“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的合作。”^{注 26}一当斯大林保住了权力,哪有什么忠诚合作?托洛茨基为自己铸定了失败的结局,成就了斯大林超沙皇专制的伟业。进一步孕育了苏联的败亡。

遗嘱的“风波”,也许该称之为“风暴”吧?其教训深矣、大矣、远矣!不可不鉴呀!

注释:

注 1、注 2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397、556 页。

注 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卷,第 232 页。

注 4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696 页。

注 5 《托洛茨基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420 页。

注 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8 月版。第 275、229 页,

注 7 同上 229 页。1922 年 7 月 7 日,列宁告诉斯大林:“试图禁止‘政治性的’探视,我非常生气,把他们(医生)撵走了,星期二加米涅夫到我这里来过,进行了一次热烈的政治性交谈。我睡得很香,自我感觉非常好。”“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的交谈。”1922 年 12 月底,允许列宁口授以来,1923 年初列宁大脑活动增加,情绪极好,健康显著进步,经常开点小玩笑,口授增多增快。但到了二、三月份,列宁又确实因格鲁吉亚问题而十分激动、气愤,而使病情急剧恶化。

注 8、注 10、注 11、注 12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429、337、342、342 页。

注 9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36 卷,第 629、630 页。

注 13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558 页。

注 1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5 卷,第 479 页。

注 15、注 16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338—339、339 页。

注 17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340 页。

注 18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703 页。第 52 卷,第 554—555 页。

注 19 《托洛茨基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420 页。

注 20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52 卷,第 553、554 页。

注 2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 卷,第 313 页。

注 22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5 卷,第 432、478、537、538 页。

注 23 《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5—87 页。

注 24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43 卷,第 559 页、340 页。第 473 页。

注 25 此段史料取自《世界解密档案》,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注 26 《托洛茨基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424 页。

(作者单位为厦门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纠错

《炎黄春秋》2009 年第 7 期《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阅后,刽子手们杀害先驱们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的暴行,在《红岩》的渣滓洞、白公馆都找不到,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也成了小巫。

“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咙,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在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炎黄春秋》09 第 7 期 56 页)

从以上文字看,张志新、丁祖晓是两位女烈士。(但 57 页的文字中写到“反对个人崇拜,丁祖晓烈士更是旗帜鲜明。他对‘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这些个人崇拜的具体形式,给以猛烈的抨击。请看他一张传单……”两次用“他”而不是前页的“她”,丁祖晓又似乎是个男烈士。)

文中提到的贵州烈士马锦征(文中误为马锦征)这个三十年前贵阳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个宁死不屈的女性。 贵州读者 黄育中

凭空编造 荒诞无稽

——评师东兵的几本书

• 高 勇

去年,华国锋同志去世后,有的网站流传出一些无端诽谤胡耀邦等同志的文章,说什么胡耀邦说“华国锋不是老实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大多是根据师东兵凭空杜撰的材料所写,于是我曾写了一篇揭露师东兵的文章,题为《师东兵写的东西太离谱》。同时,还有几位同志也写了质疑师东兵的文章,主要用事实说明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好的,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合作共事,后来一直相互尊重。这些文章发表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大约是十年前,我曾马路边的地摊上买到两本书,一本叫《短暂的春秋》,一本叫《早逝的英华》,作者叫师东兵。原以为这个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看了他写的书后,我真不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一类人。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假得出奇,他书中写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旁证,没有任何一条注明出处。特别是他写到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话,人家说话的那种场合,他根本不可能在场,因为他既无条件,也无资格出现在那种场合。第二,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负责任的纪实文学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演义小说的作者,因为“纪实文学”必须记录真实情况,“演义小说”也必须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而且编出的语言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特点,不能凭空捏造。这个师东兵由于不了解他所写的人物的特点、性格,又没有到过他写的那些场所,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所写的人物,却凭空编造出了对人物的“访问记”,所以他

写的东西只能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胡编乱造,简直达到了荒诞无稽的地步。比如,华国锋同志不幸逝世后,在海外网站上流传一篇《胡耀邦论华国锋不是老实人》的文字,据了解,这篇文字就出自师东兵所编《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这篇东西开头师东兵就含糊其词地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我问过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他说他根本未见过师东兵。胡耀邦辞职后,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敲门进去访问的,这是常识。当时凡是要见胡耀邦的人,都必须通过李汉平联系,并作出安排,连我这个曾给胡耀邦作过多年机要秘书的人要去看望胡耀邦,也必须事前与李汉平联系,由他作出具体安排才能去。那么,这位与胡耀邦素昧平生的师东兵有什么神通能撇开李汉平和那里的警卫人员去“敲开”胡耀邦的家门?

师东兵不久前针对我对他的揭露,在这件事上又编了一些情节。他说:“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见《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这一编,又编出了新漏洞,闹出了更大的笑话,更说明他根本没有去过胡耀邦家。胡耀邦自己是不接电话的,你不通过秘书怎么能同他电话约好?“坐着车进去的”,胡耀邦家的两个门都有石台阶,你坐的是什么车能爬上台阶?是坦克车吗?“警卫无权过问”,那么设警卫是干什么用的?再问他那个“领导人”、“中顾委常委”是谁?采访胡耀邦时是否有录音?他则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

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必须为信息源保密。”(同上)真是一副泼皮无赖相!

从胡的行踪也可证明,“1988年春天”师东兵根本不可能到胡家“访问”过胡耀邦。1988年春节(2月17日)以后胡耀邦同志就因身体不适住医院了,一直住到四月,出院后于5月15日就外出去河北易县考察了,请问师东兵,你是“1988年春”哪天去访问胡耀邦同志的?你总应该有记录吧?你不是还有“朋友陪同”吗?也应该有证人吧?是不是又是要保密,不能讲?

可见,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脑子没有进水的人,对党内生活有点常识的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拜读了师东兵的“编著”,可以肯定地说,他对胡耀邦的基本特点及生活习惯,根本不了解,连胡耀邦的著作他也没有认真读过,更没有读懂,许多人写的有关胡耀邦的书他也没有认真读过。因此,他距了解真实的胡耀邦少说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也因此,他写胡耀邦就只能凭“想当然”胡编乱造,以致他的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荒唐笑话。下面,从《早逝的英华》(今日中国出版社版)一书中随手拈出几条,请大家睁开眼睛:

一、第8—9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判。他多次被戴上高帽、黑牌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与此同时,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而关押起来,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4年刘湖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就连小女儿李恒和三子胡德华也在学校里被孤立、受欺凌。他们每天给被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过早地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师东兵先生,这里我给你纠正两点:①胡德平文革初未被打成“联动分子”,他与“联动”毫无关系,“联动”是中学生的组织,胡德平当时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你连这点人所共知的事都不懂!他被关押是因为受其父牵连被诬为“反动学生”。②1964年清华大学没有化学系,只有工化系。不知刘湖是怎么考进化学系的?③自胡耀邦

被关“牛棚”后,我也于1968年5月被关进“牛棚”,他的孩子只有初关的一两天给他送过饭。哪儿有“每天”送饭送药的事!当时团中央的造反派不准家属给被关“牛棚”的人送饭,我们被关的几十人都是集体排队去食堂吃饭的。

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中央由谁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



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会前邓小平就提出大会总的精神是“劳动、学习、团结”,不知道师东兵怎么编出了个“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而且我怎么也想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一直在京休养,并未再回西安,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

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这些情况当时的报刊上都有公开报

道,师东兵也竟敢胡编一套!

五、第 37 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太离谱了,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 64 至 65 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大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歉。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 84 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竟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

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 17 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当时《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

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七、师东兵说:“直到林彪摔死的两年以后,一辆吉普车在他(指胡耀邦)劳动的农场门口停住了。两位军人还有一名穿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说他已被解放。”(见第119页)这位师东兵的编造水平可真够可以的。文革中,我与胡耀邦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你编的那些情节可能蒙骗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但你不怕我们说明真相吗?胡耀邦倒是被“两位军人”叫走的,但不是在“劳动的农场”,而是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不是“林彪摔死两年以后”,而是林彪摔死三年以前的1968年10月12日晚上,就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当时,八届中委、候补中委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达百分之七十一,不准出席会议,全会要作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不够法定人数,这才临时把胡耀邦拉去凑数。当时拉去凑数的还有候补中委李志民、范文澜。八届中委共97人,十一中全会以后去世的10人,能到会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委中挑选了10名补为正式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委的半数。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方面负责人多达74人,占会议总数133人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还多。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快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请看,师东兵写的这些情节是在抢救危重心

脏病人吗?这是在拖延抢救,在折腾病人,像这样“抢救”,有多少病人也得折腾死了。师东兵既不了解现场抢救情况,又无抢救心肌梗病人的常识,却敢胡乱描写抢救胡耀邦的情况,能不露怯吗?

我不想再多费笔墨了。师东兵写的东西每一条都不真实,都是凭空编造。他常常编造中央领导两三个人在一起谩骂攻击另外的领导人,说的话都是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而且有表情、有动作,连人家内心的活动他也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种场合,你师东兵怎么会在场呢?他还多处写道胡启立和胡耀邦的秘书称胡耀邦为“胡主席”,胡耀邦称赵紫阳为“老赵”,甚至说:“胡耀邦轻轻给了赵紫阳一拳说:老赵,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这正好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性格、特点和语言习惯。他还多处编造华国锋的话语,借华国锋之口说一些师东兵自己想说的低俗下流的话,严重污损了华国锋的人品和形象。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他不但没有访问过胡耀邦,而且在其《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中,他说“访谈”过的华国锋、赵紫阳、汪东兴、纪登奎,以及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八人,也是假的,其中他说的访问纪登奎的时间竟然是纪登奎同志去世一年之后!现在上述前领导人的子女都已发表声明,郑重否认师东兵曾访问过他们的父辈,不但师东兵编造的那些访谈内容是假的,连他与某些领导人的合影也是假的。正如叶乐盛先生说的:“一个与华国锋合影都敢造假的师东兵,还有什么不敢造假呢?”这些领导人的后代多已声明依法保留对师东兵伪造所谓“访谈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追诉权。

至此,人们都已知道师东兵写的这些东西,除了姓名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这不是一般的“失实”,而是故意编造,

我们虽早已见到师东兵写的东西,但由于他完全是胡编乱造,所以根本就不理睬他,也不值得理他,要不是他借华国锋同志去世之机又出来搅乱是非,我们到今天也不见得理睬他。至于一些党史专家更是不屑于理他,因为他胡编的东西够不上与党史专家讨论的层次。

(作者为胡耀邦秘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 者 来 信 摘 登

我读了贵刊 2009 年 7 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 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 1981 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人物有 44 人被处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段文字勾起了我 40 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 1968 年 7 月 2 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

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 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原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以下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靓女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目的是借用贵刊一角,以读者来信或来函照登的名义均可,让那几个游魂的名字留下一点痕迹,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

黑龙江省读者 任振邦



记录人生，传承文化！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族画册

出书范围

一、个人作品文集：

- 1、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 2、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
- 3、时评、杂文、随笔、游记等个人文集。

三、怀旧、纪念文集：

- 1、先烈功勋评传、亲友纪念画册。
- 2、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纪念文集。
- 3、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怀旧文集。

二、家族文集、画册：

- 1、家庭文学作品、书画作品、家庭照片书。
- 2、家族先贤传记、家史档案、家谱族谱等。

四、地方曲艺、民间传说、民俗方志等。

五、旧文结集、旧书翻印、老书新出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附赠光盘）。

出版说明

一般标准：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基本价格：200页出版50本两千元，300页出版50本三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计。

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出版发行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联系出版社办理。

欢迎“组稿代理”与“设立分站”

《个人出书网》《老人出书网》自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干部、老教授与各地民间作者的欢迎，每月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族画册三十余部；为方便老龄作者洽谈与交稿，我们计划在全国各地设立“编辑出版分站”或“地方组稿代理”，请有编辑出版经验与组稿能力的个人或单位来人来电洽商合作，为保存民间历史、传承多元文化共尽绵力。

出版服务专员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老人出书网》(www.lrcsw.com)《怀旧出书网》(www.hjcsjw.cn)

公司名称：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传真：010—68920708 邮编：100089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博越商务楼6507室

长途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

李锐诗二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告别凄风苦雨秋 群英奋起创新猷
 运筹帷幄倚民主 科学兴衰靠自由
 稳定必须施宪法 和谐切莫逆潮流
 后人鉴察前人事 为政言行应寡尤

诗中末句引论语为政篇言寡尤仍感意犹未尽
 又吟得四句

米龄早过寿而康 有幸迎来改革忙
 唯一忧心天下事 何时宪政大开张

尾联取自米龄自寿诗

李锐

时年九十进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告别凄风苦雨秋 群英奋起创新猷
 运筹帷幄倚民主 科学兴衰靠自由
 由稳定必须施宪法 和谐切莫逆潮流
 后人鉴察前人事 为政言行应寡尤 诗中
 末句引论语为政篇言寡尤仍感意犹未尽又吟得四句
 米龄早过寿而康 有幸迎来改革忙 唯一忧心天下事 何时宪政大开张
 尾联取自米龄自寿诗
 李锐 时年九十进三

庆祝湖南日报创刊六十周年
 人民喉舌直言难 天外飞来大右冠
 大右冠歪路走完 归正道争鸣
 鸣监督国长安
 反右运动中湖南日报五十四人
 受难为全国报界之首 实现言论自由 舆论监督 社会和国家才能
 安定 才能现代化 此乃普世规律 马克思第一篇文章即言此理
 苏值六十周年报庆 余为首任短暂行社长 回首往事 吟得四句 为
 贺 愿生多能同仁 续创新猷
 李锐 时年九十进三

庆祝湖南日报
 创刊六十周年

人民喉舌直言难
 天外飞来大右冠
 歪路走完归正道
 争鸣监督国长安

反右运动中湖南日报五十四人受难为全国报界之首 实现言论自由 舆论监督 社会和国家才能安定 才能现代化 此乃普世规律 马克思第一篇文章即言此理 兹值六十周年报庆 余为首任短暂行社长 回首往事 吟得四句 为贺 还望各位同仁 续创新猷
 李锐
 时年九十进三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9年第**10**期

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大跃进中亳县干部作风问题记述

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揭秘台湾地下党

理论超前的经济学家董辅初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10 >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